

让精神住进空调房

□ 蝉 羽

想到这个题目,是源于昨晚在书房意外目睹了楼下的一场意外:近半夜12点的宽窄巷子坝子,一群穿的花花绿绿,走路东倒西歪的时髦青年簇拥而行,不知缘由,声音越来越高,言语的激烈突然变成了全武行,三个一身黑衣劲装的男子,直接把一个红色T恤壮男打倒在地,还要狠踹几脚,当然少不了口中决不停息的国骂,外兼嚣张、骄傲的逼视、点划不明就里的路人。打人者扬长而去,被打者无人相帮,虽然,广场宽敞,路人络绎,也时有观望。

心里除了想到报警,源源不竭的,是更多的不解、无语、愤懑乃至堵到恐慌。

我不敢、也不愿去想这世界是怎么了、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这样的年轻一代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未来、创造怎么样的一个世界等等这些宏大、惹人嫌的问题,只是因了个人成长的经历、近日的行止、随手的翻阅,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些联系和联想。

原来不大理解一些先辈关于“三块屏幕打天下”的警示,现在看到,手机屏幕以短信、微信、各式app(客户端)给我们送来了海量的“知识碎片”,却在天长日久中,令我们实在无法拼装出一幅完整的认知图画、精神图谱;电脑(Ipad)让我们方便、依赖,却也神不知鬼不觉潜移默化了东方以毛笔、纸张为载体和经纬的千年传统、思想基因、文化血脉,“字如其人”的古训时时面对着离开了键盘就不会“写字”的机械式冰冷;从小流连于电视电影,我们喜乐于猫和老鼠,沉湎于铁臂阿童木,陶醉于泰坦尼克,陪伴哈利波特降生直至长大,等候速1速2直至速7,忘情追逐各式各样

的选秀出彩血拼,千奇百怪的明星大腕巨咖,等到青春年华已逝,等到安身立命成家立业需要看家本领,等到除了莽撞血性血肉之躯可以报效,我们才发现,我们已经长久的忘记了“夜为日之闲,冬为岁之闲”;轻易的忘记了“决定一个人成就的,是他怎样利用空闲时间”;几乎彻底的忘记了由安安送米、卧冰求鲤、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恕勇毅、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等泛黄古老色调构成的传统、习俗、信仰、图腾。我们是凌乱的枝叶,我们是流漂的浮萍,我们是游荡的孤魂,我们,失去了祖先深扎的根,或者,我们,没有从我们几千年的根系中吸取遗传、营养和血液。因此欣羡别人打天下而得天下,不如自惭是我们拱手让天下甚至送天下了。

几千年中央帝国的终极迷思,一百多年积贫积弱的挨打欺辱,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物质暴富,国情下计划生育的一线单传,让我们身处的人、家、国、世代、时代,很可能成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奇观、奇迹也

或奇葩。我们的同辈很可能没有听过仓颉造字、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王羲之的书法审美嬗变,所以真的不知道汉字所传承的文化基因、书法所营建的独特美学;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因为没有读过真正的孔子、孟子、荀况,于是坦坦然然、舒舒服服的喝着于丹们混炖的心灵鸡汤,还直叹“味道好极了”;我们的亲朋挚友街坊邻居时不时的成为了千万富翁亿万富豪,却往往很真心很矫情很悲催地诉苦“穷得除了钱什么也没有了”,于是你不得不时时面对留守儿童自杀,大学生杀人无悔,研究生毒杀舍友等等西方式的现代、后现代病例反复上演,因为药家鑫那句“心里是空的”混杂的无奈无助、冰凉冷酷乃至喋血残忍,整个社会还来不及咀嚼或者咀嚼、消化完全不彻底。

据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又将非常严重,立夏不久南京、上海的几场暴雨,已经让国人把看海变为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常态。由是突发奇想的揣测:自然界在以一种天意昭示天机:该来的总是会来。正如无论盛夏酷暑,寒冷风霜,当我们肌体不适,我们会创造,会享用各式各样的文明成果,让自己过得舒适、惬意、恰到好处。

而包裹于生命肌体之内,优游于万物浩瀚之外的精神,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更是一个需要日常照拂、时时打理、精心呵护的成长物啊,长久没有新鲜、全面的营养,就会得各种各样的营养缺乏症;长期的冰冻抑或暴晒,就会造成干枯或者死亡。

让我们像照顾我们的肉体一样,顾念一下我们的精神吧。

让精神住进空调房,在这变化急匆、暴雨暴热的天。

巴蜀史志

(双月刊)

2015年第3期

(总第199期)

主管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办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马小彬

副主任：王孝平

编委会：

马小彬 王孝平 汪毅

高志刚 陈思禄 李冠华

邱俊 李思源 余正道

王少卿 周正琴 余崇威

陈永毅 夏建平 李勇

何斌 冉炬 师伟

杨文 李卫东 任真

刘启蓉 尹克发 邓瑜

陶利辉 高伟明 熊倩

孙玉峰

主编：马小彬（兼）

副主编：王孝平（兼）

编辑出版：《巴蜀史志》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熊倩

执行编辑：刘艳平

封面题字：何海霞

本刊地址：成都市永兴巷15号21楼

邮政编码：610012

编辑部电话：(028) 86522061

编辑部邮箱：bsszbzb@163.com

印 刷：四川川林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028)86980225

注：本刊如有印刷问题请与印刷企业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卷首

让精神住进空调房

蝉羽

时政辑要

04 领导同志谈地方志工作

05 打牢思想政治建设根基 夯实引领创新发展基础

——省志编委举行中心组(扩大)暨市(州)主任学习会，召开省地方志学会七届四次理事会 潘认若 刘艳平

封面故事

08 文化名人与都江堰

王国平 马定萍

12 都江堰的岁修

杨瑞文

15 堰官制度与老灌县水利府

王克明

志鉴研究

18 浅谈县级方志机构在部门志编纂中的作用

杜育和

20 方志编纂与区域文化发展关系试探

吉正芬

——以四川为例

22 旧志校勘初探

李宏川

——以《犍为县志》为例

苟长征

25 对综合年鉴光盘制作的思考

史料之窗

27 川渝两地的“天后妈祖文化”

孙晓芬

31 武侯区的老街景

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

34 体现历史文态的内江“十贤坊”

刘德元

蜀中人物

38 记参加诺曼底登陆作战的邻水人姜瑜

丁禹强

40 怀念张善子先生

陶世琼



民俗风情

42 羌族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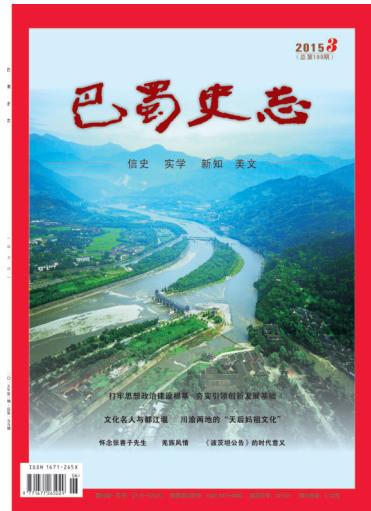
陈 康

读志用志

- 46 修志环境对地方志事业发展的作用 朱浩然
48 地方志行政执法的误区及对策 李宣德 李 超

抗战胜利70周年

- 50 《波茨坦公告》的时代意义 潘夕潮
52 追忆抗日爱国名将潘文华



封面：晨曦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摄影：周孟棋)

简讯

- 56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政府法制办、省志编委组织专项调研
57 省志编委开展地方志工作调研
58 《四川省志》第二十三次终审会召开
59 《四川省志·九寨沟志》编纂工作积极推进
59 成都传达贯彻第八次全省工作会议精神
59 德阳市方志文化进学校在中江启动
59 内江“四大契机”促推史志工作
60 乐山创新修志举措
60 乐山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
60 广安召开区市县志办主任会议
61 雅安市召开《汶川特大地震雅安抗震救灾志》终审会议
61 眉山市人大常委会向市政府送交《条例》实施情况审议意见
61 眉山市召开地方志工作会
62 探究历史规律 镜鉴资治育人
62 甘孜贯彻落实第八次全省工作会议精神
62 金牛区数字方志馆正式上线并向公众开放
63 叙永县贯彻两办《意见》
63 中江开展方志文化进村社活动
63 嘉陵区全面启动乡镇(街道)志、部门志编纂工作
63 江安、筠连开展史志资料征集工作
64 高县开展史志宣教工作
64 兴文“四个确保”安排业务工作
64 色达县“五举措”加强年鉴编纂工作
64 西昌市出台乡镇志部门志审查验收意见
64 美姑县认真贯彻落实两办《意见》

出版时间 2015年6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1—265X
国内统一刊号 CN 51—1616/K
邮发代号 62—311
国内发行 四川省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广告许可证 川工商临许(2001)153号
定 价 7.00元

本刊部分图片系资料图片，请作者与本刊联系以奉稿酬



领导同志谈地方志工作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出席“第四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讲话时指出，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弘扬方志文化，发掘历史智慧——中国历代方志整理与研究”，我们以“发掘历史智慧”为借力点，将其与历代方志整理与研究工作相结合，确定本届年会的主题，主要是为了更深入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批示、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更好地挖掘历代方志这座庞大的地情、国情资料宝库，深入开发利用地方志文化资源，以史鉴今，启迪后人，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更系统地梳理方志编修历史，进一步明确历代方志整理和研究的重点，提高历代方志整理与研究的水平。

地方志编修，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也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部分，是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资料宝库、知识宝库、智慧宝库。

截至目前，全国地方志系统以点校、注释、影印、复印、扫描、原版复制等方式，整理出版数千部历代方志。这些丰硕的果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明宝库中重要的瑰宝，对于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央领导同志历来重视修史修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于2004年10月视察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勉励村民把《白沙村志》继续编修下去，把新变化写入新村志。2006年12月，他在温州市苍南县考察台风“桑美”灾后重建工作时，调阅了《苍



南县志》，并用志书记载的材料告诫地方干部要以史为戒。近来，他强调“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11月，李克强总理就《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出版，再次作出重要批示。突出了地方志编纂的知识汇集聚集作用及存史资政价值，将地方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中国地方志学会是开展方志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年会可集中精力研讨二轮修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后要组织制定历代方志整理工作规划，有计划地集中整理历代方志；科学设置历代方志研究专项课题，为方志学学科建设打下牢固基础，提升方志学的地位和影响力；有针对性地开展海外藏中国历代方志的引进工作，推动历代方志数字化建设，逐步建立全国历代方志资源数据库；大力培养历代方志整理专业人才，确保历代方志整理与研究的质量；有重点地分类编辑历代方志资料，集中力量挖掘历代方志中蕴藏的丰富资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智力支持，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本刊综合)

打牢思想政治建设根基 夯实引领创新发展基础

——省志编委举行中心组(扩大)暨市(州)主任学习会，
召开省地方志学会七届四次理事会

为落实省委关于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工作部署及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的有关工作安排，4月28日至29日，省志编委在对口扶贫联系点古蔺县，举行中心组(扩大)暨市(州)主任学习会，召开省地方志学会七届四次理事会，深入学习全省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会议，特别是省委文件和王东明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全省地方志系统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新思路、新办法，努力打牢全省地方志系统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根基，引领全省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

这次中心组(扩大)暨市(州)主任学习会，共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动员思考。即从通知下发之日起到27日报到时止，要求每一位与会同志要认真学习省委文件和王东明书记讲话要求，结合本单位和自身思想实际，精心准备发言材料。二是认真学习。省志编委为每位参会人员准备了比较全面的学习材料，要求参会同志提前认真学习。三是集中学习。即28日、29日的大会，以交流发言、座谈讨论等形式，让每一位参会人员都谈感想、谈问题、谈对策。四是实地考察。28日下午，会议安排了参会人员赴红军四渡赤水中二渡、四渡的历史发生地太平渡参观考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五是落实阶段。强调不是会议结束了，任务就完



省志编委中心组(扩大)暨市(州)主任学习会会场

成了，要求参会人员回去后，认认真真落实省委的安排部署，落实省志编委党组的工作要求，落实此次会议达成的工作共识，使省委和省级相关部门的要求，真正在全省地方志系统生根发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围绕“为何学、学什么、如何学”，作了学习动员。马小彬指出，加强地方志系统思想政治建设是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的迫切要求，是贯彻落实国家、省委省政府有关加强地方志工作部署的必然要求，是加强新时期地方志系统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他强调，深刻认识和努力解决新形势下地方志系统班子队伍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需要学讲话、明方向。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省委王东明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需要学法规、知责任。要认真学习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以及我省新修订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两办下发的《意见》，牢固树立法治观念，用好手中法律依据，牢记肩头法律职责，传承四川依法治志优良传统，营造依法治志的良好社会环境。需要多读书、养底气。要多读政治理论、哲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运用唯物辩证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地方志工作。他要求，要注



重搞好结合，自觉把学习落实全国会议、省委会议精神、“三严三实”教育活动、落实“两办”《意见》、贯彻中指组“两个会议”、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和学习地方志工作法规、工作理论、工作实践等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充分认清当前形势任务新变化、对班子建设思想政治素质新要求，始终保持政治定力。要注重灵活方法，坚持原文学习，集中研讨，办班学习，讨论交流，实地参观感悟，丰富学习形式。要抓好成果转化，着力破解地方志系统在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班子及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在地方志事业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突出问题。

在认真听取会议代表发言，分析研判各方建议意见后，马小彬就进一步加强中心组学习、推进全省地方志系统贯彻落实全省领

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会精神提出了五点要求。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利用例会学法、中心组学习、支部学习、干部培训等形式加强学习，把握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关于推进中央精神四川化的重大决策部署，把学习东明书记重要讲话与加强地方志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结合起来，凝神聚力，振奋精神，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二要不断增强地方志部门负责人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通过全面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志工作，加快形成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良好工作氛围。三要不断增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意识，按照中央、省委部署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省纲要要求，深入贯彻《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川委办〔2015〕9号文件精神，牢固树立依法修志意识，积极推动依法行政、依法用志、依法传志、依法管志工作。四要把全力推进地方志事业的“五业并举”任务落实落地，努力推出一批有文化特色、有社会影响力、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国情、省情、地情的精品力作。五要坚持学习、不断提高本领、真正担当起协调推进本地地方志事业的职责使命。各级地方志机构负责人、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要增强本领





四川省地方志学会七届四次理事会会场

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有针对性地学习补充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及信息化技术、地方志的理论与实践方法等，努力锻造合格的地方志工作负责人。

按照会议要求，每一位参会人员均认真学习会议材料，联系实际精心发言，逐一就学习贯彻中央、省委部署，严守政治纪律、严明政治规矩，加强地方志系统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做到“守纪律、讲规矩、重程序”，切实尽责“抓班子、带队伍、促发展”等作了发言，为达到抓住关键少数、抓好关键少数、提高履职能力、引领事业发展打下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领导基础。

省地方志学会七届四次理事会从加强和改进组织建设、宣传贯彻《条例》、积极组织开展学术活动、开展业务指导与培训工作、积极参与中国地方志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等方面，总结了学会2014年度工作。要求深刻认识、主动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机遇，解放思想、转变作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理论研究，促进学科建设，发挥学术研究的桥梁纽带作用，为方志事业科学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按照学会章程，会议审议通过了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省地方志学会会长马小彬提名的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人选，及根据工作需要进行的常务理事、理事等人事调整事项。马小彬要求各级地方志学会深入组织学习中央、省委系列重要会议精神、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省地方志中心工作，发挥独特优势，优化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深化活动效果，强调要加强考察调研、活跃学术研究、实现资源整合、做好服务工作。

省志编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王孝平对做好2015年的学会工作提出了三点思考：一要强化落实意识，逐条安排布置，做到上下无缝对接，实现全省全系统工作的同频共振，真正凝神聚力，形成合力，实现效力。二要强化组织意识，抓好活动开展，切实做到有活动、出成果、出人才。三要强化大局意识，抓实有效载体，服务领导服务会员。

各参会理事围绕落实省地方志学会2015年工作要点，就怎样加强和改进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工作的组织领导、课题研究、合作交流等展开讨论，提出了统筹安排课题项目、分片实施并建立课题管理制度，抓分级培训、重点放在市州、兼顾县（市、区），每年开展专题性学术研讨，全省建立专家库、资源共享等建议。

省志编委副巡视员汪毅，机关各处（年鉴社）负责人，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部分省级部门地方志机构负责人共40余人参加会议。

（潘认若 刘艳平）



文化名人与都江堰

□ 王国平 马定萍

都江堰——青城山，是闻名遐迩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古今中外，有多少伟人、名人、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来此参观、考察、游览。自汉唐以来，不少文人雅士更是在此留下了大量流传千古的诗文，使都江堰和青城山声名远播，游人如织。

离堆之上怀太史——司马迁在都江堰



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考察、旅游和记录都江堰的第一人。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奉命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过蜀郡（成都）时，到都江堰作了实地考察。在《史记·河渠书》

中，司马迁翔实地记载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于蜀，蜀守冰凿离碓（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均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后人为了纪念司马迁，先后在离堆之上建造了西瞻祠，县城西门之南建造了西瞻堂，时过境迁，这些古迹都已不复存在。

锦江春色来天地——杜甫在都江堰

锦江春色来天地，
玉垒浮云变古今……

公元761年，一代诗圣立于挺拔峻美的玉垒山麓、浩荡奔流的岷江之侧，临江迎风，忍不住豪气干云，脱口而出一



杜甫

首《登楼》，遂成千古名篇，世代传诵。

杜甫公元759年弃官，移家成都，筑寓草堂，期间，遍游巴山蜀水。

杜甫看见了李冰用以镇水的石牛时，写下诗句“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这是一首破除迷信，倡导科学的好诗。

杜甫游览宝瓶口时，写下诗句“灌口江如练，吞崖雪似银”。登玉垒山，写下诗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参观青城山时，写下了千古名句“自为青城客，不睡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观看岷山沱江画图时写下了诗句“沱水临中坐，岷山到北堂”。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如一座涌动着生命活水的长城，那光照千秋的英名，使得一代诗圣杜甫感慨万千，留下了诸多名篇。



苏轼

夜度绳桥看伏龙——苏轼在都江堰

苏轼，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知识渊博，才如大海，一生佳作迭出，万人称颂。他在《送鲜于都曹归蜀灌口旧居》一诗中写道：“茧尽霜须照碧铜，依然春雪在长松。朝行犀浦催收芋，夜度绳桥看伏龙。莫叹倦游无驷马，要将老健敌千钟。子云三世惟身在，为向西南说病容。”

山如翠浪尽东倾——陆游在都江堰

在都江堰留诗最多的诗



陆游

人，当属南宋大诗人陆游，他曾数次游览都江堰和青城山，写下诗歌36首，其中许多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陆游字务观，早年号热瞒，中年入蜀后号放翁。公元1170年岁末陆游到成都，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后曾两任蜀州（今崇州市）通判，因为报国无门，一直非常失意，于是便纵情山水，寄寓诗词，淳熙元年（1174）他来到了都江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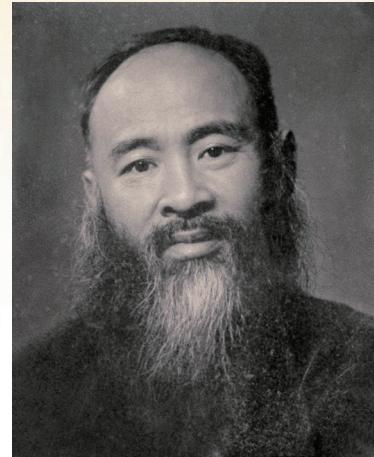
“西山大竹织万笼，船舸载石来无穷”他的《视筑堤》一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岷江防洪抢险的壮烈场面，堪称一篇劳动者的不朽颂歌。“姓名未死终磊磊，要与此江东注海”他的《登灌口庙东大楼观岷江雪山》一诗，不仅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而且为我们留下了“千年雪岭栏边出，万里云涛坐上浮”的壮美画卷。另一首《离堆伏龙祠观孙太古画英惠王像》，称颂了李冰“千年遗迹人犹诵”的伟业，记述了孙太古画像的高大精美，慨叹“寥寥后世岂乏人，尺寸未施谗已众”的可悲世态，一咏三叹，令人感慨。

陆游在青城山也留下了许多诗篇，如描写青城山景色的“慵追万里骑鲸客，且伴千年化鹤仙”。描写青城峰峦和上清宫的“云作玉峰时特起，山

如翠浪尽东倾”“永夜寥寥憩上清，下听万壑度松声”。描写储福观的“路转屏风叠，云藏帝子家”。描写长生观的“碧天万里月正中，清夜珥节长生宫”。每一首诗中无不饱含着诗人对都江堰和青城山的挚爱之情。

平生梦结青城宅——张大千在都江堰

被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的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



张大千

与青城山结缘半个多世纪，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8年10月，为躲避战乱，张大千第一次登上青城山，半年后，张大千举家迁往青城山上清宫文武殿，一住就是两年。他在山上喂养猴子、白黄鹂、白斑鸠，还有一只豹子，供自己写生作画。

1943年，张大千再次携家上青城寓居，一住又是两年。他请农民当向导，攀藤跃涧、越野登山。青城山为张大



千的绘画带来了巨大的灵感。在前后寓居青城山的四年时间里，张大千创作出了《雨后丈人峰》《策杖高士》《张天师像》《青城玉鸦》《墨荷》《花蕊夫人像》《麻姑像》《红叶小鸟》《玉女图》等上千幅作品，并收下丁明修、龙国屏和胡立三个大风堂门人。

1948年秋，张大千先生故地重游，第三次登上青城山，在上清宫小住一段时间后，去雪山寺研究了明代壁画。因为张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黄君璧、萧军、熊佛西、老舍、张聿光、赵望云、易君左等文化人和张大千的朋友也慕名前来青城山，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

20世纪50年代后，张大千旅居国外，作巨幅山水画《青城山全图》挂于园内，朝夕相伴，慰藉赤子之心。1968年，张大千在台湾举办“张大千长江万里图特展”，卷首便是都江堰的鱼嘴、安澜索桥、玉垒山、离堆、宝瓶口、赵公山。

1970年，张大千移居美国，一位广东华侨开了家川菜馆，张大千欣然为其题名《青城山》，并画了一幅《青城第一峰》图挂于餐厅正中，让美国人民领略青城山的丰姿。

1981年，张大千先生的女儿张心瑞和女婿萧建初去美国探亲，特意带去了青城山的

照片和大千先生留在青城山的书画石刻拓片，大千先生非常高兴，在病榻上挥毫写下“青城山上清宫”六个大字，由女儿带回四川，赠青城山。六个字字含情，凝聚着大千先生对青城山深情的眷恋之情。

苍崖时有凤来仪——徐悲鸿在都江堰

1943年春，在重庆举办完个人画展的徐悲鸿带着学生来到幽翠绝伦的道教圣地青城山写生作画。

徐悲鸿到了灌县（今都江堰市）之后，首先去玉垒山麓游览都江堰和二王庙。二王庙冷寂尘封，显出几分破败，但是，在徐悲鸿眼里，这种破败却有一种林深古刹的艺术灵气。临别之时，徐悲鸿解囊为二王庙捐赠二万元，以资殿宇的维护和修缮。

到了青城山，徐悲鸿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每天用餐时，道士们还专门为爱吃西红柿的

徐悲鸿做一碗西红柿汤。为了便于创作，徐悲鸿住在“小住为佳”客房，在易心莹师父的帮助下，徐悲鸿将西客厅辟为画室，在这里开始屈原《九歌》中的插图《国殇》《山鬼》《湘君》《湘夫人》《东皇太一》《云中君》等的创作。并将《国殇》《山鬼》画成大幅国画，寓意歌颂为国捐躯的抗日战士和故国诗人的情怀。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还将自己的作品于国外销售，所得画款用以救助祖国难民。

天师洞的巍峨殿宇，暮霭中的古刹红墙，密林里的蜿蜒石级，潺若天籁的白云溪，张陵手植的汉代银杏，以及集仙桥、朝阳洞、三岛石……无不凝聚了徐悲鸿活泼的艺术词汇，青城风光，尽由先生泼墨挥毫，一幅《青城山风景》将青城山风光展露无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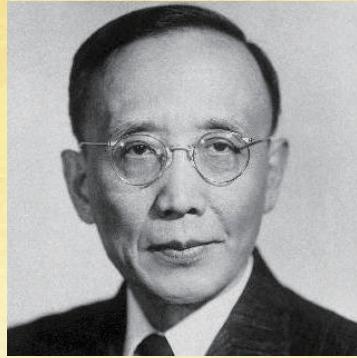
我为离堆来正名——郭沫若在都江堰

司马迁考察都江堰之后，他没有想到“沫水”居然会在以后的数千年里被人们反复辨析、争论、考证。这场争论最终因为郭沫若的到来而停止。

1955年4月，郭沫若来到都江堰参观游览，了解到当时国内考古界争论不休的“沫水”“离堆”问题，马上展开考证工作，他白天数次登上离堆，实地勘察，晚上则彻夜不眠，挑灯查阅资料，同时与国



徐悲鸿



郭沫若

内知名的老学者、老专家、老教授仔细商榷。经过反复推敲，反复勘察、反复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离堆就是在都江堰宝瓶口处，并用他那苍劲的书法写下了一段题记：

“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两千数百年来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离堆所在，或以为乃嘉州乌尤山。余，嘉州人也。今至此观宝瓶口，犹余斧凿迹。谓在嘉州者，乃妄说耳。青城近在眉睫，未及登临，为一憾事。”

他以考证正视听，为都江堰解决了一个困扰多年的难题。

古往今来，到过都江堰的文化名人不计其数。唐代的著名诗人李商隐、贾岛、岑参以及隐居于青城山味江一带的唐求；唐末五代著名道士、学

者、文学家杜光庭；闻名千古的北宋诗人张俞；清光绪年间曾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的宋育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诗人、大书法家于右任；一生钟情青城山的著名学者、文学家和书法家谢无量；以及一游再游都江堰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等等，他们都曾在都江堰和青城山留下足迹和诗作。

（作者单位：都江堰市文联、都江堰市史志办公室）

稿 约

《巴蜀史志》是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管、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地方文化刊物，双月刊。以“信史、实学、新知、美文”为追求，设有方志论坛、年鉴指导、读志用志、爱志人语、史料之窗、人物春秋、古迹考辨、史海钩沉、风物名胜、民俗风情、艺苑风采、稗史逸闻、读书随笔、域外传真等栏目。为进一步丰富内容、提升水平、服务发展，现诚挚约稿：

学术文章。应有：内容摘要（180字左右）、关键词（3-8个）；标题不超过20个字；作者简介（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参考文献按顺序列于文后，请注明详细出处。字数控制在4000字以内。

其他文稿。文责自负。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不要重复投稿。字数控制在3000字以内。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15号21楼
邮编：610012
邮箱：bsszbjb@163.com
电话：(028)86522061

《巴蜀史志》编辑部



都江堰的岁修

□ 杨瑞文

岷江水量丰沛，流速快，冲击力强；洪水季节江中悬移质、推移质含量大，河道极易淤积，堤堰毁损的情况连年发生。因此，建在岷江中游出山口处的都江堰就必须年年岁修和防洪抢险。

每年冬春枯水季节，都要组织灌区民工治理都江堰，这就是通常说的“岁修”。岁修始于何时，史无明文。相传李冰主持创建都江堰时，曾在风栖窝下埋石作深淘标记。《蜀中名胜记》：“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足证内江引水渠首河床下确有石马存在。传为李冰所刻的“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正是岁修的要旨，说明岁修之举古已有之。《宋史·河渠志》：“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这是对都江堰岁修最早的记载。

岁修的主要任务是修复被洪水损坏的堤堰；具体作法大略如“三字经”所述。

“深淘滩，低作堰”。“深淘滩”指内江引水渠道要深淘去淤。都江堰虽有自动分水分沙功能，但内江引水渠风栖窝下面一段河床每年仍有大量沙石淤积。这段河道的深淘，对于保证内江灌区有充足的水量用于灌溉至关重要。“低作堰”指飞沙堰不宜作得太高。过高则内江进水太多，影响灌区安全和泄洪排沙；太低则内江引水不足，影响农田灌溉。《宋史·河渠志》云：“岁作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这是对古代飞沙堰高度最明确的记载。现在的飞沙堰一般以高出内江河床二米左右为宜。“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流传最久，是都江堰治

理的大纲，它兼顾了引水和泄洪排沙，保证了都江堰的灌溉效益，是都江堰诸多治水经验中最重要的两条。

“挖河沙，堆堤岸”。堤岸是兴利除害的重要设施，历来十分重视。疏浚主河槽，用挖出的大量沙石加高加固河堤，一举两得。

“分四六，平潦旱”。都江堰的巧妙布局，起到了自动分水的作用，即冬春水少，内江进水六成，外江泄走四成；夏秋水盛，内江进水四成，外江泄走六成，不潦不旱，既保证灌区用水，又防止灾害发生。

“水画符，铁桩现”。“水画符”指宝瓶口右侧岸壁刻的水则，是判断内江水情的标志。都江堰早在李冰主持创建时，就开始了水情测量。《华阳国志》：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

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就是以江水淹没石人的部位判断水量的大小。宋代开始在“离堆之址刻水则。则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传郎堰减水河泄归于江”。元代增至十一划。乾隆三十年（1765）膝兆棨、汪松承重刻水则十划。随灌溉面积的增加，水则逐渐增至二十二划。“水画符”就是要人们注意水则的刻划和使用，掌握水情变化，防止灾害发生。“铁桩现”，指风栖窝下卧铁。为便于掌握深淘标准，李冰曾在风栖窝下河床埋石马，后人又埋铁板作标志。明代万历后开始在风栖窝下埋卧铁，共埋设四根，今存三。一为明万历卧铁。清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水利同知强望泰组织岁修时挖出，“长一丈，径五寸，上署永镇普济之柱，明万历四年造，字三寸”。二为清同治卧铁。同治三年（1864）观察何咸宜督修都江堰时增铸，上署“大清同治三年缵緝贻则之柱”。三为1927年左右官兴文治理都江堰时补铸，上有“署成都水利知事官兴文造”字样。清光绪间铸的卧铁一根已不存。卧铁是深淘的标志。淘挖河床，淘到卧铁才算淘够了深度，一定要淘到“铁桩现”。

“笼编密，石装健”。竹笼是古代都江堰工程的主要构



件，又称“竹落（络）”“竹篓”“篓石蛇”等，用竹蔑编成。《元和郡县志》：“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中，累而壅水”。《堤堰志》：“笼石护岸，水不蠹土而渠可持久”。竹笼能将若干卵石组成一个沉重而又能渗水的整体，易于互相连接重迭，形成重荷直压水底；河床变形时能随河道变迁曲折下沉，紧固堤基，在都江堰得到广泛应用。“石装健”就是要装饱满平整、较大的卵石用于头尾及四周，笼心装中等卵石，每个眼孔用扁平石封堵，做到一眼一石。笼石的好坏直接关系工程质量，所以“三字经”中对笼石十分强调。

“砌鱼嘴，安羊圈”。过去砌鱼嘴要以“羊圈”工程护底，就是在河床深坑中四角立四根大木柱作骨架，四边用横木连接，再往四壁插上“签子”，形成如羊圈似的木框，

中填大卵石即成。这是一种保护顶冲部位河床基础的有效办法。羊圈工程做好了，鱼嘴才能牢固。

“立湃阙，留漏罐”。“湃阙”即溢流堰。内江河道有平水槽、飞沙堰、人字堤三道“湃阙”，用于泄洪排沙，保证灌区安全。“漏罐”指人字堤处暗涵引水口，即金堤堰，引溉塔子坝一带四千余亩农田，不可堵塞。

“三字经”的内容主要涉及渠首治理。两个“八字格言”包容的范围则要大得多。“遇弯截角，逢正抽心”，概括了岷江及灌区输水排洪河道的治理要旨。“遇弯截角”，指河流弯道要截去凸岸沙滩角，在凹岸设排流护岸，以改变主流方向，减轻主流对凹岸的冲刷，防止灾害的发生。“逢正抽心”指顺直河道应浚深河床中间部位，堵塞沟汊，使主流集中于河道浚深的过水断面，



达到“安流顺轨”的目的。“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即要掌握水势和其他有利的自然条件，利用有利因素，消除不利因素，达到兴利除害目的；要从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采用适当的技术手段，解决面临的问题。

岁修一般由堰务机构主其事。按岁修工程需要，组成岁修工程处，或大修工程处，或特修工程处，或岁修工程指挥部，办理岁修事宜。岁修人力的组织，长期采用包工制。技术工种，长期以来，一般是父子相传、师徒相传，形成了杩槎工、泥埂工、船工、淘河工、砌石工、编笼工、装笼工、栽桩工等“八大班”包工制度。

民国时期，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后，由都江堰管理处、灌县水利会对干渠主要堰口、溃缺河道、堤段逐一进行查勘，确定工程项目，编制经费概

算，报经四川省水利局批准后，按内外江断流次序拟定施工计划，组织堰工按图纸设计要求施工。竣工后，由水利会验收。《都江堰水利述要》云：“岁修工作，年有常例。初期修理外江，自霜降节起开始截闸。外江河口断流后，应行淘挖砌筑工程，在春节前一律完成。旋将外江开放，截闸内江河口，即将内江下游应施工趁时修理，清明节前一律完竣，复开启内江”。民国时期岁修情况大致可见。

新中国建立后，由县指挥部下达岁修任务，各乡镇根据任务需要组织民工，指定专人，负责施工。至1973年前，岁修都由都江堰管理处统一管理。每年10月，都江堰管理处组织干渠有关县对岁修工程进行查勘，召开灌区工作会议，分配经费，各县再查勘、安工，将岁修劳力、材料落实到各乡镇，按断流先后，

组织施工。岁修结束后，验收、清工结帐。1973年后，都管处以县设站，县境内工程岁修由县负责。1978年后，县境内各灌溉干渠岁修查勘、安工、设计、施工分别由渠首处、人民渠、东风渠、外江管理处负责。民堰整修实行分级管理。支渠口以下至斗渠口，由县水利电力局勘安、设计，所在乡镇负责施工，经费、材料由县水利电力局报销。斗渠以下由乡水利会勘安、设计，材料、经费由乡镇自行解决。

都江堰岁修，持续时间长，工程量大。据1936—1946年统计（中缺1943年），岁修用1151.4万工日，挖土石方151.9万立方米，装竹笼10.88万条，栽木桩5798立方米，耗用其他材料645.97万公斤。正是灌区人民年复一年的巨大付出，才有年复一年的好收成，才造就了闻名遐迩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内江

堰官制度与老灌县水利府

□ 王克明



堰官设置的历史

李冰修建都江堰后，留下一支管理堰工的机构叫湔氐道，负责工程管理和维护，兼理地方民情。汉升湔氐县，另设水官“都水尉”“都水长”等管理堰务，汉灵帝时（168—189）设置“都水椽”，属于“水衡都尉”“内史”和“主爵都尉”的属官，专职负责维护都江堰渠首工程。西安汉代城中出土的“蜀都水印”泥封，以及1974年安澜索桥附近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刻像，有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汉灵帝年号，公元168年）“都水椽”字样，可资佐证。

三国蜀汉时（221—263）丞相诸葛亮在视察了都江堰后认为“此堰农本，国之所资”“调征丁夫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乾隆灌县志》）除

承前制在都江堰设置堰官外，还派遣了一支1200人的堰兵队伍，由五虎将之一的马超率领以护堰。

曹魏灭蜀后，在都江堰设“晏官令”，兼管堰务。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在益州分设剑南东川、剑南西川节度使。都江堰事，由西川节度使下设专员专管。

宋初，由益州知事、成都府事分级管理。中期在成都路设转运判官，管理堰事。

元代亦如宋，地方兼管水利的为判官，位于知州、同知之下，与县令平，为正七品。

明初，省、州以下立县，都江堰事由灌县知事兼理。因无专人管理，堰务废弛。弘治三年（1490）派刑部员外郎刘世熙升任“按察佥事”，主持都江堰维修。后又设“按察司佥事”“水利道”等专门机构

负责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管理和维护。

清代的堰官设置和水利衙门

清代，再次设置管理都江堰的堰官——水利同知，水利衙门遗存——水利府，在灌县老城区保留至今。

清雍正六年（1728），改成都军粮同知为成都水利同知。雍正十二年（1735），水利同知知府由成都迁到灌县县署右侧原典吏署，管理都江堰。初名管粮水利厅，又称成都水利厅，后改为水利同知署。设东西两岸房屋，各有典吏3人，文书办理若干人；东案办理堰工；西案办理懋、抚、绥、崇、章五屯粮饷，属成都府，由布政使统其事。后罢西案，保存东案；设冬、春两班典吏2人，经理堰务，并设水勇24人，巡查河工。以后，水利府编制65人，其中



官员14人（包括同知1人，典吏7人，帮书6人），由省财政发俸银；差役49人，工资在原华阳县地丁税中划拨；堰长、夫头各1人，工资在岁修工程费中开支。水利府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达183年之久。

光绪《增修灌县志》（1886）在“水利同知署”栏载：“在县署右，系旧捕厅署，雍正十三年以成都水利同知移驻，建头门、仪门各三间，大堂及东西厢房各五间，二堂三间，左右客厅各一间，大花厅三间，二堂后蜈蚣架一道，左右厢房各三间，三堂五间，厨房二间。光绪九年，署同知盛时彦培修东西科房、壅壁并彩画匾额联。”据说当时的水利府内有三间穿斗房屋供奉着历代的治水有功官员。让神水与水利知事同在，举头有神明，咫尺见前勋，激励官员为水利事业殚精竭虑不懈努力。光绪《增修灌县志》的《县治图》与乾隆五十一年《灌县志》的《县治图》为同一张图，于“县署”西面的建筑上标注“水利府”。

据中国水利协会会员、著名的都江堰水利专家吴敏良老先生考证，水利府旧址在今幸福路上段，这处遗迹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设立，距今已有270多年历史。吴敏良老先生称，“水利府”是目前全国

仅存唯一的一座古代水利衙门遗迹。之所以称之为“衙门”，是因为水利官员不仅有维护和管理水利工程之责，还有办理水务案件之权。若有破坏水利工程者或因用水而发生纠纷的案件则由水利官员进行审判，审判后再交由地方典役署去执行。

如今，在原电影院以东二十米处、一排商业店铺中间，有一条两三米宽的小巷，沿着小巷前行，一座毫不引人注目的瓦顶老旧大院呈现在眼前，大厅为木梁，高约七八米，厅后平行并列着又一座较小的瓦木建筑，两厅按东、西朝向而建。据当地居民说这就是清代的“水利府”。“水利府”的使用一直延续至抗日战争时期。

民国时期都江堰的专管机构

据民国《灌县志》载：“民国元年改成都水利同知为水利委员，逾年，改水利知

事，编制27人，仍驻灌县，隶属西川道。后更名为都江堰驻灌县水利委员，职权过小，堰将不治。……民国八年，改委员为成都水利知事，崇其职权。”

民国二十四年（1935）设四川省水利局于灌县，统管都江堰。民国二十五年（1936）7月，四川省水利局迁成都，扩大组织管理全省水利。8月，由省水利局派员在灌县成立都江堰工程处，编制28人，专管渠首工程。灌区中县地方工程由省水利局主持。民国三十三年（1944）8月，改组都江堰工程处，扩大成立“四川省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隶属省建设厅，编制84人，管理都江堰全灌区。

在民国《灌县志》的《灌城街道图》上明确标注了“成都水利署”，位置在井福街以西、文星街（现为文庙街）以



幸福路新水利府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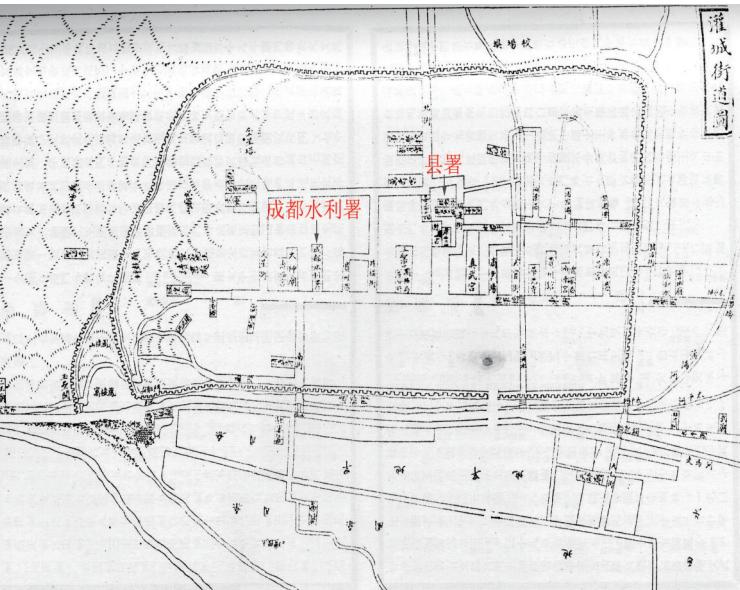
东的东街（现为幸福路）上。

建国后都江堰管理机构的变革

1950年1月2日，川西行政公署接管原“四川省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改组成立川西都江堰管理处，编制43人。

1952年9月1日，川西行政区撤销，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都江堰管理处归口“四川省人民政府财经办公室水利组”管理。9月28日，都江堰管理处有史以来第一次设立管理站，分别在蒲阳河设石坝管理站，江安河设河坝场管理站，柏条河、府河、毗河设石堤堰管理站，每站5—7人，分别管理各河系灌溉、防洪、岁修工作。1953年3月，为加强各河水管理，决定增设都江堰灌区二级管理站，都江堰设一等站4处，二等站47处；西河流域设一等站2处，二等站6处；朱李火堰设二等站3处，并制订了管理站组织办法。1954年12月1日，四川省水利厅批准都江堰管理处编制为113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管理维护逐步走上规范化道路。

1978年12月13日，经省政府批准建立“都江堰灌区管理委员会”，成立都江堰管理局，由省水电厅领导，统管都江堰灌区水利事务，渠首工程由下属的渠首处负责管理。



旧水利府衙门逐步变成“居民院”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成都市常遭日本飞机的轰炸，四川省建设厅临时迁驻青城山办公，省水利厅迁驻灌县伏龙观、二王庙、禹王宫、纯阳观分散办公，职工家属集中住进“水利府”。都江堰工程处职工先后租用塔子坝“罗家大院”民房、文庙街“曾家院”、太平街任敏良“公馆”办公住宿；1944年扩大成立“四川省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租用原“四川省旅行社”（现都江堰市政协驻地）全部房舍作为办公和生活之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省水利局迁回成都，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移驻伏龙观办公，并将单身宿舍和部分家属安置于“水利府”。

1955年，都江堰管理处

由伏龙观迁至公园路60号办公。为解决居民搬迁问题，把“水利府”让出部分并利用空地修建住房进行安置补偿。1958年9月，岷江发洪水，冲毁楠木园木材流放收漂工程，漂木顺流而下，经都江堰管理处宿舍、县农具厂、天乙街，由塔子坝入江安河，冲毁了一些沿河居民住房，部分无房可住的居民被安置于“水利府”。以后，都江堰管理处逐步修建宿舍，职工逐步迁入公园路、复兴街生活区，“水利府”也就逐步变成了完全的“居民院”。都江堰管理局已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成16层现代化办公楼，成为都江堰老城区的标志性建筑，古老的“水利府”逐渐被人们遗忘。

（作者单位：都江堰市档案局）





县级地方志机构是地方志系统最基层的工作单位，不仅担负着县级行政区域志及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工作，还应切实履行职能，在专志编纂尤其是部门志编纂方面发挥统筹规划、科学引导、组织协调、合力推进的职能作用，推动县级地方志工作科学发展。

审视方志机构在部门志编修中的地位和作用

部门志是记述某部门各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文献，是行政区域志的必要拓展和有效补充，种类繁多的部门志与行政区域志共同构成了一个行政区域内完整的地方志体系。县级地方志机构在部门志编纂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法定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第

(一) (二) (三) 款对地方志机构所要履行的职责分别作出如下规定：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工作”当然包括部门志的规划和编纂，“地方志书”也应包括行政区域志及专志。

县级地方志机构在部门志编纂中的作用是由现实状况决定的。修志编鉴均离不开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修志实践告诉我们，修志的进展快慢及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料的完备和丰盛程度。而目前县级各部门对资料存储意识淡薄、疏于管理，造成资料散失损毁，严重影响今后修志对资

料的需求。因此，县级地方志机构在抓好主业的同时，积极倡导推动编纂部门志不失为一条搜集、整理、规范、保存资料的极好途径。

县级地方志机构在编纂部门志中的作用是由地方志机构的工作特长决定的。地方志机构修志编鉴是长项，是内行。事实上，县内任何一家单位在编写部门志时，都会主动联系县地方志机构，希望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到其部门志的编纂工作当中。

县级地方志机构在编纂部门志中的作用，是地方志机构本身所期盼的。为县级部门修志服务，既体现方志工作者的价值，展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风采，又可通过发挥地方志机

构的作用和方志工作者的智慧，使地方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机会创造价值，争取理解和支持。从另一方面来看，利用修志部门为我们创造的条件，将方志队伍拉上修志工作练兵场，参与到编纂部门志的实战中去，也可在实践中磨砺、提升、丰富、检验方志队伍的业务能力。

凸显方志机构在部门志编修中的主导作用

编修部门志，修志单位是主体，履行部门志编纂过程中的领导、协调、服务等方面的义务。县级地方志机构应在部门志编纂中注重发挥宣传造势、合理规划、因势利导、指导帮助、督促把关、参与协作、承揽加工等方面的作用，实现部门志编纂的优质、高效、双赢的目标。

强化宣介，营造编纂部门志工作的良好氛围。一是在领导层面宣传地方志工作法规，并力争纳入领导干部普法教育内容，以提高部门领导对修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不失时机地推介外地部门志编修成果及成效，激发部门领导组织编纂部门志的热情。三是宣介县内有关单位编纂部门志的典型事例，通过横向比较，以责任意识和成就感激励部门开展修志工作。

合理规划，做好部门志编

纂工作的顶层设计。一方面要合理规划，全盘统筹。根据具体情况，编制出若干年度的部门志编纂规划，按照“先政府系统再党群系统、先块管单位再条管单位、先综合性职能单位后单一性职能单位、先修志条件成熟单位后修志条件不足单位”的原则。另一方面要开展顶层设计。就是帮助修志部门拟定方案、设计编纂篇目、物色编辑人选、培训编辑人员，指导资料征集和志稿试写等，引导编纂工作尽早走上正轨。

因势利导，把脉部门志编纂工作的启动时机。一般情况下，部门庆典、人事变动（主要领导将离任或新任）、机构改革、上级下达修志任务、领导注重文化建设、社会需求强烈等都是推动部门启动部门志编纂的契机。县级地方志机构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抓住有利契机，积极沟通，敢于担当，奋发有为，协助该单位尽快启动部门志编纂工作。

指导帮助，增强部门单位开展部门志编纂工作的信心。许多部门对修志工作不了解，经费不足，缺少修志人员尤其是缺少懂修志业务的骨干，对能否编好部门志底气不足、信心不足。基于此，县级地方志机构就应高调履职，主动给予部门以指导帮助，协助修志单

位理清修志思路、编制经费预算、培训编纂人员、开展编纂业务，消除修志部门的顾虑，以地方志工作者的专业优势提升部门修志的信心。

督促把关，把握部门志编纂工作的正确方向。指导编纂单位实事求是地制定编纂计划，并遵循“先快后慢，进度服从质量”的原则有条不紊地开展部门志编纂工作。配合编纂部门分阶段开展编纂工作督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及时帮助修志单位审阅志稿，提出操作性强的修改意见，牢牢把握修志动态，时刻引导部门志编修工作的正常开展，在进度与质量相协调的情况下，如期完成编纂出版任务。

承揽加工，拓宽部门志编纂工作的新途径。县级地方志机构要抛弃门户之见，破除行业樊篱，开门修志，扬优成势。可将部门志编纂任务项目化，大胆承揽那些虽无条件修志，但又有强烈愿望要求编纂部门志的单位的编纂任务，与相关单位签订编修协议，既获取社会效益又锻炼了修志人员，达到地方志机构与修志部门双赢的目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弋阳县地方志办公室）



四川编修志书传统的形成是在整个中国方志学演进与演变的大背景下逐渐产生的。未来的四川方志与四川区域文化的发展有何联系？我们可以试着从以下方面来讨论。

第一是传统方志与蜀文化的关系。四川历来是农业大省，人民安土重迁，省籍区域范围较为辽阔，民族众多，川内各地人民生活状况不同。正因为如此，大一统这个课题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央政府最关怀的事。无论是三千多年前的周天子时期派采诗官到十五国去搜集“国风”，与京畿的“雅”“颂”合编成《诗经》，抑或二千余年后的明清时期各省州府县各自修志，中央再合编《一统志》，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在保存地方文化风俗人情的同时，强调贯彻“华夏”“大一统”等意识。古代方志的编修者大都是读过《四书》《五经》的读书人，这些人深受儒家思想洗礼，在编修方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将儒家文化的各种观点有意或无意的灌输到其编纂的志书中。中央王朝的“教化”与地方的“文化”始终维持一种既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如传统四川旧志中充斥了大量的忠义、节烈等人物，其有关叙述相当详实，这些固然是地方官为了反

方志编纂与区域文化发展关系试探

——以四川为例*

□ 吉正芬

映其治下的政绩，但忠义、节烈这些观念本身，却又是儒家传统的核心理念。因此从文化的观点而论，我们可以说四川方志既包含了古代巴蜀地区独特的文化内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始终贯彻其始终；换句话说，就是它既有独特性，也有普遍性。

第二是四川方志未来体例的发展。方志学者费尽心思去讨论方志的本质问题，思考方志究竟是地理书、行政书还是

历史书。到了二十世纪新方志学奠立，因为科技发展迅速，中国也因受到列强侵略社会开始变革，方志随着近代新经济的发展与兴盛，开始朝着百科全书的方向发展，渐渐被认为是综合反映一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地情资料的综合性著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方志学家傅振伦即在其《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中提出方志是独立而综合的学科，这一观点也得到同时代其他一些学者的响应与认同。最后，逐渐演变为“地方性综合百科全书”这样一个定义。了解方志学传统在近代的这一变化与发展，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和探索方志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保存文化，是有很大帮助的。近年四川方志界多强调以多元化的观念，灵活运用不同的体例来编纂方志，越来越多的方志工作者开始意识到方志需要更多不同专业的学者来参与编纂，同事也要注重现代学术发展的新成果对其影响，因而传统定型化的方志在今天实在有不合时宜之处。近年国家和四川开展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编纂就突破了传统志书的限制，改以新的形式呈现。四川省志编委也从四川特色旅游资源及特产的角度出发在第二轮省志的编修中，增加了8

*本文为西南民族大学2013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文本与权力——近代康藏地区方志编纂研究”阶段成果。

部特色志，打破了原来省志分卷设计的格局。

其实，方志的体例从来没有定型过，历代除“一统志”具有特殊统一的要求外，从明代到清代中央政府虽然多次颁布方志体例，但各省府州县并未严格遵守；以四川清代各地所修县志为例，其体例与内容安排，一直保持高度的灵活性，流传下来的方志有门目、纪传、三书等体例。因此，方志可以是地方史，也可以被写成“百科全书”，也可以被写成“地理著作”，我们始终要意识到方志本来就應該保持一种灵活性，既要保存地方特色，又要保存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联系。若坚持其某一种体例不放，恐怕都有“举一废百”的危机。

第三是方志如何反映地域人文风土的特殊性。自古以来修志就因地域的不同而使志书内容有不同的偏重和考虑。一般志书都以建置、沿革、山川等为首，如明代四部《四川总志》和清代《四川通志》《成都府志》。至于边疆、民族地区志书所偏重的内容，和《成都府志》一类的体例就不一样了。如清代《打箭炉厅志》里有关“理番则例”的内容便不为《成都府志》所需。又或者其他一些偏远地区，如四川的剑阁、犍为等地，在清代地处

偏僻，其志书内容更显特殊。如同治十二年（1873）重修《剑州志》序：“端承公（著者按：即知府李梅宾）之命不敢辞，乃复周游乎州之四境。山也，必涉其巔，崖也，必探其腹。……越期年而成书若干卷。”在修志的过程中，搜集资料与考察古迹是同时进行的。这种艰辛的过程，是成都平原的人士所不容易了解的。

此外，如《崇庆州志》，专门设有《江原文征》（崇庆古称江原，今为成都市下辖崇州市）。崇庆在川内为人文高度发达的地区，工商业亦较为兴盛，设立《文征》自无问题。像成都平原附近的地区修志，秉持章学诚提倡的重视文献的基本观点，效果自然不错，但在人口密度不高、文化发展亦较为滞后的川西、川北等偏僻地区就不容易了。他们不得不避重就轻，择其紧要的，易于表现的地方特色加以发挥。如清代四川《屏山县志》，虽然其纂修者主观上也很重视该地文献古迹和人文表现，但全书八卷中《艺文志》占了两卷，而人物志（包含忠孝、宦绩、文学、善行、列女、流寓、仙释等十一类）仅占第五卷的一半，全书的十六分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屏山地处四川南部，毗邻云南，接近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并不是一

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繁荣之地。由此可见，地理位置和方志体例之间的关系也是方志工作者所不能忽视的。

以四川第二轮市县志书的编修而言，编纂者在选择体例，建构全志骨干的时候，就不得不从当地的特殊性去思考采用何种体例妥当，而不必囿于所谓志书体例定型化的意识。如省会成都作为全省甚至整个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交通志、贸易志等就应该特别详细。又如近年国家开始在这里试点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实验，也应详加记录，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经验等内容更不可忽略或简写。再如作为中国科技城的绵阳，则应详述各项生产数据尤其是科技发展成果。而在川西的阿坝、甘孜州这样的民族地区，则要凸显其特殊的人文风土，不必过于兼顾其共性的部分。特别是今日交通发达，人民迁徙容易，上述涉及到民族地区的方志编纂，还要考虑到由于交通、移民、大量游客涌入等因素而带来的文化内容的改变，包括习俗、庆典、信仰等各方面的变迁，地方志都应详加反映。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



旧志校勘初探

——以《犍为县志》为例

□李宏川

旧志是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犍为县于2012年启动了旧志整理工作，2013年年底出版了嘉庆《犍为县志》，2015年启动了民国《犍为县志》校勘工作，计划2015年年底付印。

嘉庆县志的校勘

反复权衡，先期校勘嘉庆《犍为县志》。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有清一代，三度大兴修志之风：康熙时期、乾隆时期、嘉庆时期。《犍为县志》若说内容之丰富，后者更胜一筹。一是卷一图考志，前所未有的，所绘河道源流、水利设施及文庙、县署等建筑全貌，不仅具有存史价值，而且绘图精细，可与国画之工笔媲美，插图与

文字记述相得益彰，图文并茂。二是卷三建置志，分门别类，全面周到，县内祠庙、寺观、坊表无一遗漏，细到名人墓冢，记载之多，始见此志。史上“金犍为”之得名，缘于产盐，而盐业情况记述之详者，亦唯嘉庆县志，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三是卷八人物志，入志人物达180有余，论人数之多，众多版本无一能及，即以现代眼光来看，亦不乏为师表者，嘉庆县志教化育人之功能无可置疑。

对嘉庆《犍为县志》的校勘，本意力求保存原貌，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对原刊本中段落不明者，结合上下文意并参考有关文献分段或者合并。对于旧志中为避讳，或尊崇历代帝王，而在文字排列方面作抬头处理的，悉予取消，按文

意重新编排。断句标点力求符合现代阅读习惯，又能准确贴切表达原意，一般先断句，继明理，再标点。用字注意改、补、删，保留繁体字、异体字，不作更改，对于明显的错字、讹文，加注说明并改正。尚有不能肯定者，则保存旧貌，以待识者。对传统年号纪年，一仍其旧，不必注明公元纪年。夹注用“（）”，以别于正文。

不足之处多多，如在尊重原著、保持原貌、修旧如旧方面即是瑕瑜互见。

民国县志的校勘

今年5月，启动了民国县志校勘工作。具体做法是：

（一）断句。校订主要是断句加标点。断句力求准确，以不损害原文涵义为红线，同时努力做到正确使用标点符

号。

有的本可不加标点，但加了更便于读懂，采取加标点办法。例如，人物志“烈女李氏传”中，有一句话用了3个“夫”字，但字义不同：“夫指驱明义，至死不负其夫，虽谓尚存可也，即谓其夫尚存亦可也。”句首那个“夫”字，应读作“扶”或“乎”，表感叹语气，作语气助词。所以标点为“夫！指驱明义……”。

对各种名词，按照原版，基本不加括号；但个别地方不加括号怕发生歧义，所以加了括号，比如上司“给以积善成名匾额”“给从一而终匾额”，对“积善成名”“从一而终”加括号，一读就知括号中的字便是匾额上的字。再如“邢縕”这个人“邃于春秋”，春秋，书名，为战国时鲁国编年史，若不加书名号，恐难理解，不但加了书名号，并在“校注”中说明。

(二) 脱漏。一是原文脱漏。比如，“赵少卿墓表”中“公讳时，字□□”，“字”之后脱2字；“□□□出一车”，“出”之前脱3字；“昔班固称□□□□兒宽”，句中又脱5字。对这样的原文脱漏，考订较难，不过此类情况不多。

二是古文力求简练，但有的用语过于省略，便显得脱漏。比如“彭列女传”中：“石工某佩刀入室，强逼云：不从，则杀汝……”这“不从”之前缺少主语，劫财或劫

色，语焉不详，“不从”什么，让人猜测难解。

(三) 衍文。虽说古文精炼，但衍词衍字也有不少，比如“李列女传”中：“吾已追及二人，为定之期於二月初四日来迎矣，也不必更问妹氏愿否也”。句中“为定之期”，写为“定期”，一样明白。“矣”字是“了”的意思，表已然或必然，既不很妥帖亦显多余。后一句“也不必更问妹氏愿否也”，省去，并不损害全文意思。

原文中还有诸如“当是时”的“当”、“盖年甫二十有六云”的“盖”“云”、“越明年二月”的“越”等明显多余。

(四) 错讹。一是有的字可能因为校订疏忽而出错。比如“孙甫，邃招易学”，应是“邃於易学”。明孝宗年号“弘治”，多处误为“宏治”。“地方公益名所擘画”，“名”应为“多”。“为之所焉”应为“为之计焉”。

二是有的字属于使用出错，编者考虑不周。比如“按察史”“布政史”，其中“史”应为“使”，均为官名。民国版和嘉庆版“周正传”中的“游历兵荒”，经查乾隆版，方知应为“游历兵荒”。“游”(荐)，一再，一次又一次。李元模为乾隆辛丑年进士，却误为“辛未”年，相差30年。

三是有的词句，编者有随意改动之嫌。比如人物志“王

叔倫”条有一句“退而为山颠水涯、娱忧舒乐之言，岂不可感哉”。“娱忧舒乐”，嘉庆版为“娱忧纾悲”，乾隆版为“娱爱悲纾”。后一句“岂不可感哉”，嘉庆版与民国版相同，只有乾隆版为“岂不可憾哉”。各版肯定有对有错，我们加了校注，未加评论。从全文所要表达的意思看，似应为“娱忧舒乐之言，岂不可憾哉”。

四是行文不慎造成错讹。比如人物志(下)33页“本志断至辛亥”，但查民国时期纪年并无“辛亥”年。从该志“后记”时间民国26年推算，下限只能是在此之前，而此前只有民国24年(1935)为“乙亥”年，所以，此处“辛亥”应为“乙亥”才对。

李锦源的字、号，在文进士名录中为“蓉艸”“仲岷”，而在人物志(下)24页，字、号为“蓉艸”“季莲”，“季莲”为讹。

对错讹之处，为忠实于原著，都不衬字补句改动原文，只是加注。

(五) 注释。由于文言文语多生僻，且典故不少，读懂多有困难，因此本次校订酌加注释，同时力求简明，一般只注其然，不注其所以然。

一是对异体字、通假字、少数繁体字加注。异体字如：“艸”即“草”，“繖”即“伞”。通假字如：“讼”通“颂”，“反”通“返”，“傅”



通“附”，“豈弟”通“愷悌”。繁体字如：“鬪”即“斗”，“籲”即“吁”。

二是对生僻字加注。如“鹾”：盐曰咸鹾；“瘖”（山），瘖疾；“矧”，作“况”字解；“赑屃”（币戏），即“蠕龟”，碑下的石座习惯雕作“赑屃”的形状。

三是对典故加注。在物产与经济志中有许多书名，原文说得不全，此次都一一加注。例如“本草”，是说详见《本草纲目》；“说文”，是《说文解字》一书的简称；“尔雅”，书名，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广雅”，书名，为研究古代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资料；其他诸如“禽经”“禹贡”“六书”“群芳谱”“太平广记”“扬子方言”等，都一一予以加注。

人物典故如“孙甫”条中有“值宸濠叛”一句，校注：“宸濠，明太祖子，宁王权之后，弘治中，袭封宁王。正德己卯年，据江西南昌举兵造反，后为王守仁战败，被擒，诛于通州。”

余光祖赞陈天佑诗中一句“则史迁所传鲁仲连不肯帝秦”，加注：“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善于计谋划策，常周游各国排难解纷。秦军围赵都邯郸，曾以利害进说赵魏大臣，劝阻尊秦昭王为帝。”

“夷齐”，指伯夷、叔齐兄弟，商朝孤竹君的儿子。周武王灭商后，兄弟2人逃避到了

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所有注释，力求抓住要领、关键，意在起到触类旁通、一通百通的作用。

旧志校勘的体会

（一）人才共享方为上策。整理旧志，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专业的人才；出版旧志，也需要专业审稿和编辑人员。从旧志整理工作的内容来看，旧志整理工作人员必须具有一定文言知识、文史知识，了解和掌握相关古籍的历史背景、有关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等情况，甚至包括古籍装帧等相关门类的知识，并具备较为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必须力求正确理解古籍，仔细推敲，尽量使整理后的旧志与原志表意一致，以便于读者阅读理解。

旧志整理要求高，标准严，而方志部门专门人才凤毛麟角，稀缺之至，甚至到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地步，所以资源共享、人尽其才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二）以古为镜裨益良多。从整理旧志中，我们看到旧志对政情，特别是地情，记载相当详细；人文古迹搜罗甚广，内容丰富；可读性、资料性，无可置疑。因此，出版旧志，不仅有利于宣传犍为，进一步提升知名度、美誉度，而且利用遗产资源服务于现代经济建设，发挥的作用将是无可估量的。

（三）曲径通幽甘苦备

尝。旧志均为文言写作，又不加标点，若照版翻印，虽然能够保存原貌，但能够断句读懂的人不是很多。读不懂就影响利用，这就有违出版旧志的初衷。整理嘉庆县志时，考虑到精通古文之人奇缺，所以趋易避难，只是作断句加标点，但仍然在标点和字义的校订上出现一些失误。这让我们感觉到今后更要慎之又慎，需要严格考察，高标准严要求，并加强审稿环节，努力避免或减少硬伤和差错。

整理出版民国旧志时，在作断句加标点的基础上，酌情增添注释，力所能及的帮助读者了解内容，借此机会传播国学，弘扬历史文化，对县志办的工作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尝试。

由于犍为历史悠久，资料浩繁，加之记载歧异，见仁见智，往往真假难辨，莫衷一是。这就需要对这些资料做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订工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相关历史资料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

（四）领导重视仍是关键。整理出版旧志实为细致艰苦的工作，耗时费力，整理过程、印刷出版，尤需经费保障。犍为县因为县委、县政府领导重视关心，经费保证了需要，工作方能顺利开展。

（作者单位：犍为县地方志办公室）

对综合年鉴光盘制作的思考

□ 荀长征

从2008年开始，峨边县在编纂出版年鉴时，开始附带制作以年鉴为主要内容的电子光盘，截至2014年已制作“光盘年鉴”6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对其现实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其基本要求和一些改进探索值得总结。

制作“光盘年鉴”的现实意义

有利于宣传普及地方志相关知识。光盘作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媒介，在国内已经有了极高的普及率。制作“光盘年鉴”，是适应现代媒体传播形势的必然要求，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地方志工作中的必然应用，具有制作方法简便、制作成本低廉、使用保管方便的显著特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宣传和普及地方志工作的目的，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有利于年鉴的检索和使用。制作“光盘年鉴”是应用多媒体技术和检索技术，将纸质版年鉴的内容信息存储在光盘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电子阅读器或有类似功能的设备阅读，是纸质版年鉴向电子网络版年鉴发展的过渡形式。目

前，全国地方志系统编纂出版年鉴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受到各级领导、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的普遍好评。但由于纸质版年鉴不便于使用和查阅，不便于保存与携带，制约了社会各界读鉴、用鉴及年鉴编纂机构之间的交流，大大降低和限制了年鉴的实用价值和使用范围，而光盘具有检索、使用、保存、携带方便的优势，“光盘年鉴”应运而生。

有利于保存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当今社会发展不断进步，为地方志工作带来了生机。单一只用纸质保存史志资料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人们不断追求多彩文化营养的需要。视频、声音、图像等比较直观并方便使用的媒介，与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已经分离不开。所以，保存除文字以外其他格式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光盘这种存储工具派上了用场，“光盘年鉴”是保存年鉴史料的必然选择。

有利于为续志积累电子资料。20年左右编纂一次的地方志书，需要大量的文字、照片和数据资料，由单位或者个人去查阅、分类归纳和打印，不仅费时费力费工，也容易遗

漏、错误和混乱，给地方志书编纂带来困扰。而借用光盘这个载体，制作和保存好“光盘年鉴”，资料收集轻而易举，简便快捷，成本低廉，效果良好。

制作“光盘年鉴”的基本要求

完整性。包括内容和结构的完整。比如重大活动的图片和视频资料要尽可能选载，以弥补纸质版年鉴篇幅有限的不足；结构可分为片头、内容、片尾，各个页面之间须尽量保持连贯，不能出现无效链接即“死页”。

准确性。指文字和系统的准确。由于纸质版年鉴用于编排的方正系统或华光书版软件，与光盘版制作软件不能进行无缝对接，两者之间需要进行转换，加上纸质版年鉴的原错，可能超出新闻出版署规定的错误率标准。同时还可能出现软件检索错误，即漏检或错检。所以，要严加核校，查错堵漏，确保“光盘年鉴”准确无误。

美观性。光盘界面要尽量符合美学观点，既要时尚新颖，又要突出地方特色。年鉴的文字、统计数据（表）、图



片（照片）三大类资料，必须与多媒体资料有机结合，在丰富纸质版年鉴信息容量的同时，给读者留下美的回味，这是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之一，是其容易被使用者接受和喜爱的重要举措。

兼容性。光盘适应的计算机环境，要“面向对象而设计”，必须具有较为广泛的兼容性，才能保证不同硬件环境下均能够便利地使用。既要适应主流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又要适应网络环境下的 Windows NT 操作系统，还要兼顾国产 Linux 操作系统。即使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也要充分考虑与 Windows9X、Windows2000、Windows X、Windows7 不同版本的兼容。

应用性。“光盘年鉴”的功能要完备，必须能够实现全文检索、文本编辑、图片浏览和下载、音频视频播放等功能。尤其要在检索功能上下功夫，力争实现集全文检索、主题词检索、目录检索、图表内容检索等超强检索功能，确保“光盘年鉴”在现实中的方便适用。

制作“光盘年鉴”的探索实践

六年来，在坚持体现完整性、准确性、美观性、兼容性和应用性的同时，我们不断改进、完善和提升，使“光盘年鉴”与纸质版年鉴互相补充、水乳交融，主要从以下三方面



着力。

内容更丰富翔实。相比纸质版本，光盘版的内容更完整，史料更丰富，可弥补纸质版年鉴篇幅有限的不足。其文字、视频、照片更丰富而清晰，涉及全县各行各业；集文字、图形、图像、动画、视频、录像、声音、音乐等传统表现媒体的整体优势，给地方志带来了全新的感觉，丰富了地方志编纂成果。

检索使用更方便。“光盘年鉴”界面清晰，菜单布局合理醒目、检索方便。光盘内容可以复制，大部分主要文字都可以自由复制粘贴，进行利用和修改，给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利用年鉴提供了便利。在制作光盘的过程中，照片难免被压缩，质量有所下降，我们在光盘里单独保存了原始照片，每张照片还标明了注解，以备以后编纂县志或者其他书籍时，可以使用到原始照片，而且地图和照片在浏览过程中，还可以随机放大观看，使

用十分方便。光盘装载素材上，除正文单独存放一个 word 格式文件外，原始照片、歌曲、电子版一并刻录进光盘。“光盘年鉴”可以拷贝到 U 盘或电脑里独立使用，使用者外地出差、异地交流，查考、了解、掌握峨边信息数据，它就是一个小型资料库。

地方特色鲜明。我们在制作“光盘年鉴”时，既考虑其时尚新颖，又重视突出地方特色，体现峨边特有的小凉山彝族特色文化。彝族美神“甘嫫阿妞”是我县民族文化品牌，我们用她作为光盘封面，只每年变化光盘色彩。光盘歌曲上，采用峨边的县歌——《青青峨边、亲亲家园》，作为主打歌曲。它是峨边精神文化的象征，激发峨边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眷眷之情，其他歌曲主要是收集部分峨边词曲作者创作的彝族歌曲。

（作者单位：峨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川渝两地的“天后妈祖文化”

□ 孙晓芬

从老金堂与城厢古镇的福建移民聚落说起

清代成都府是闽籍人的集中地，其中老金堂及其县治城厢就是一个典型聚落。

“老金堂”的闽南方言岛金堂县（包括城厢，原为金堂县府治所）境内保留有四种方言，与清前期的大移民息息相关。不仅有通行全县至今的金堂话，还有“老湖广话”（湘语）、广东话（客家话）和福建话（闽南语）。“老金堂”境内的闽南方言岛的分布，在城厢（今属成都青白江区）、赵镇（现今金堂县府治）、淮口镇及周围农村，包括祥福、大同、玉虹、绣水、姚渡（今属成都青白江区）、太平、官仓、栖贤、三星、同兴、长乐、三烈、转龙等乡。

“老金堂”与城厢古镇的

会馆建筑 “老金堂”境内的会馆很多，其中清代福建籍移民及商家建有“天子宫”“靖天宫”“福汀馆”等会馆建筑，分布在城厢、祥福、赵镇、官仓、姚渡、太平和淮口等地，供奉福建地方神祇林姑天后。其中淮口的“靖天宫”作为当代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载入新修《金堂县志》（第二十八章《胜迹文物》），是福建南靖人共建的“天后宫”，故名“靖天宫”，基本格局保存完好。县志详尽地记载了其区位、建筑面积和结构。

“靖天宫”在淮口镇北半边街，面临沱江，占地942平方米，四合院布局，从残存的碑文看，约建于清乾嘉时代。

从县志上的记载推断，城厢境内福建籍移民建的会馆至少还有两座：一座“福汀

馆”，福建汀州人兴建；再一座就是城厢东街的“天子宫”，人称“福建馆”。该馆共两进，宅院宽大，房间众多；从山门进入，有一个很宽的大院坝，戏台建在山门上，山门对着正殿；正殿高大雄伟，解放前相继有县警察局、国民卫队在此驻办。

两次西部大开发与闽人的大批入川

福建籍人大批西进到两千多里之遥的巴蜀大地，远则要追溯到清朝前期的“湖广填四川”，近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中期的西部大开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空前的向四川人口大迁移，从康熙中叶开始，经雍正至乾隆中叶，历时百余年，对四川近现代的历史影响深远。其中



福建籍入川的人数位居第四位，兴建的会所不完全统计有200多座。天后妈祖会馆，四川称之为“天上官”“天后宫”“天妃宫”等，在全川东西南北的城市乡镇皆建有，最远的在川滇交界的会理州有3座；成都府所辖的16个州县建有近50座“天上官”，其中建得较多的有金堂县8座，崇宁县7座，灌县4座，华阳县3座。成都府城中的1座福建会馆，始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位于繁华的总府街口。来蓉的福建商贾财力雄厚，其会馆以建筑奢华、会产生房甚多而闻名。成都府城中的西玉龙街有“大福建营”“小福建营”，是缘于清初福建籍军人奉命驻防成都扎营，此地名相传延用至今。川南的“天上官”建得最多的荣县达12座，犍为7座，屏山4座；川北的南充县、营山县、广元、东乡县（即宣汉县）、中江县、遂宁县和合江县，皆是每县有七、八座会馆；川东的重庆府和州府中的璧山县和定远县（武胜县）均在七、八座以上，即是“县城1座，城乡皆有之”，江津县境内10座，其“天上官”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其余9座会馆在乡间。有的会馆是两省籍的人民共建，如重庆府綦江县东溪的“万天宫”，就是江西人与福建

人合建的，至今建筑保存完整。

有的地方文献反映了清代移民会馆的建筑经贸和在当地的社会作用。如新修《金堂县志》详尽记载了淮口“靖天宫”的建筑规模；民国《长宁县志》详尽记载了各省籍会馆的财产经费来源；重庆大商埠的“八省会馆”，以禹王宫、万寿宫、南华宫、天上官建筑最为雄伟魅丽，清代的《重庆府治全图》中绘制有“八省会馆”的位置；富顺的“天后宫”位于东门，载入清同治《富顺县志》的《新城图考》中……

有的地方文献记载有会馆在场镇兴建中的重要作用。如射洪县太和镇就有“五省会馆在此兴场立市”的说法。有的场镇的兴旺与新镇的重建，闽商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如射洪县的沉溪镇原为“川北盐业重镇”，清康熙年间湖广、赣、粤、闽、陕、黔等迁川客户先后在其两岸建会馆，其后逐渐形成三街两巷集镇，制盐、榨油发达。再如遂宁县的“天上官”因其区位兴街，故此商业街得名“天街”沿用至今。

清前期入川的福建移民约数十万人，在四川主要从事商贸（山货、烟行、熬糖业等），手工业的盐业，种植业

中的经济作物烟草、甘蔗等，对四川经济的恢复与繁荣、经济作物物种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闽籍移民后裔中出现了不少近现代的优秀人物，最为著名的是我国的大文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郭沫若，清末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现今被中国楹联学会尊为“联圣”的清末楹联名人钟云舫等。

自20世纪30年代起，皆有闽人到四川；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大批闽籍商人、企业家到巴蜀大地来发展。巴蜀的闽籍商家以成都及成都平原经济圈为中心辐射全川，以重庆市区为核心辐射大重庆全境。涉足的行业数十个，尤以房地产开发、装饰、鞋帽、百货、建材、皮革、服装、辅料、汽车配件、化工、医疗投资和水暖器材影响较大。现今在四川地域有3万多闽商，在重庆直辖市地域有万余名闽商。每当中国农历新年、清明时节，他们会返回福建故乡与其亲人团聚，敬祖、祭祖，共叙亲情、乡情。

妈祖会馆百年变迁

成都府治城福建馆被霸占
盗卖 始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的成都府城区福建会馆是一个三进的馆舍。地跨三

一条街，“前门在繁华的总府街，后门抵华兴街，旁门通福兴街，规模甚大，房产甚多，又有铺房数十间”。民国二十年（1931），时任市长的黄逸民把福建会馆天后神像移至后殿，与其部属刁文俊盗卖前殿、中殿、侧殿及地皮改建宅院，中饱私囊。后殿原有十余间房舍先后被吞食，继军阀占用之后，1938年又被警备部占去，只剩下后殿几间房。

重庆天后宫毁于“九二”大火 1949年9月2日，重庆朝天门一带发生大火，天后宫因毗邻朝天门半边街而被殃及，全部被大火吞毁。邻近的江西会馆也遭重创。

自贡天后宫有缘育才使命 贡井是清代后期崛起的盐城，陕、闽、粤等省籍盐商拥入开发。闽商到贡井办井灶赚钱，旋将家乡神祇天后请进来以护佑其更加发达。自贡天后宫始建于清咸同年间，占地广，是典型的山地会馆建筑，宫殿正殿供奉天后妈祖塑像。清末随着贡井盐场的衰落，闽籍盐商返回原籍，天后宫成为无主神庙。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贡井的高初两等小学在此办学，后曾复建天后宫；1938年在此新办旭川中学，20世纪80年代末拆除老食堂——天后宫，唯有精美巨大的黄浆石“九龙图”镶嵌在



遂宁“天上宫”

新建的校园石砌屏墙上，见证天后妈祖办学育才的济世善举。

气势恢宏的遂宁市“天上宫”地标长存 清咸丰元年（1851），闽籍商家在遂宁城中建起“天上宫”，此街道因天上宫而繁荣，故得名“天上街”，一直沿用至今，成为遂宁市中区的商业中心，地标街名。该会馆占地4320平方米，由山门、戏楼、书楼、正殿、装饰塔和庭院组成。

“天上宫”的木雕艺术精美，也有石雕、砖雕。山门前的二十五幅戏剧故事造型优美，人物栩栩如生。山门后檐坊上雕的四龙两凤图，刻技精

妙。遂宁市人民政府拨专款维修“天上宫”，并将它定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1世纪初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整体搬迁至城北西山路，是整体搬迁保护成功例。

李庄的“天上宫”（玉佛寺）熔于古镇佛文化 李庄的“天上宫”是福建籍人营建于该镇线子街，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山门、戏台、前殿、后殿、厢房组成，占地面积2117平方米。该地闽商颇富，购进诸多缅甸玉



李庄“天上宫”



石，请高手雕琢成妈祖像和佛像计36尊供奉，因而被誉为西南第一大“玉佛寺”。古镇自1982年起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受到保护，“天上官”被宜宾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该寺被更名为“玉佛寺”，成为该古镇的“佛教圣地”。

江津仁沱镇真武场会馆群中的“天上官”真武场位居綦江笋溪河，水路交通便捷，是重庆、贵州等地物资中转的好区位。聚集此地的客家人抓住发展机遇，先后建起赣、闽、粤各地籍的会馆，真武场成了一个大码头。真武场因客家人而起，客家人因码头而兴。现今的江津仁沱镇真武场是闻名百里的节假日游“三古”（古码头、古黄桷树、古建筑）休闲地，其中会馆古建筑群座落在“灵官祠居”周围呈品字形排列，其建筑均是四

合院格局：南华宫（广东会馆）宏伟的正殿建筑保存下来；万寿宫（江西会馆）大门楹联和四合院建筑尚在；“天上官”的妈祖庙，占地面积大，建筑壮观，图案精致，大门上钟云舫题撰的石刻楹联保存完好：上联“崇封溯宋元以始”，下联“钟灵在闽蜀之间”，横批“天开福运”，道出了闽人对原乡的眷恋与对新乡的热爱与祈福。现为重庆市（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联圣”钟云舫及其题撰的会馆楹联选

钟云舫，晚清年间的一位杰出文人，被今人誉为中国楹联文坛上的“联圣”。

钟云舫谱名祖棻，是钟氏移民江津的第七代“祖”字辈裔孙。他的楹联作品达四千余幅，收入《振振堂》专辑的“仅得其半”（有将近一半失传），其中有数百幅楹联生动

的反映了闽籍移民入川祖先及其后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诸面。因其德高望重，被乡亲推举任江津天上官会首，深入各乡镇参与乡亲聚会，为各地会馆题撰诸多楹联，记录了闽人长途迁徙、开基创业的艰辛，反映了姓氏祠堂、生辰、婚丧习俗的血缘文化和会馆地缘的乡情文化、海神妈祖的信仰文化，抒发了对原乡的无限眷恋和对四川江津富饶新乡的深爱。这些闽籍移民社会和文化的生动写照，是全方位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文化中一笔不可多得的历史财富，弥足珍贵。如题江津天上官上元灯会楹联：“匀铺着一万八千星，高悬宿卫，武则有烈，文则有光，瞧瞧瞧，琼树琪花，是天子昭明圣瑞；忙过了三百六十日，才得安闲，愁什么风，焦什么雨，来来来，金尊玉斝，与父老谈叙乡情。”

“海月圣灯，由南闽八千里来，光远自他而耀者；天文地耀，禔西川亿万民福，帝力于我何有哉！”

虽然宏丽的江津天上官不复存在了，但仁沱镇的天上官历经百余年幸得保存下来，亲见“联圣”钟云舫的墨宝真迹，重温眷眷乡情乡愁。

（作者单位：四川客家研究中心）



武侯区的老街景

□ 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

倒桑树街的吊脚楼

近年来成都市武侯区的棚户区、危旧房改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无数老城区的居民走出自己居住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陋居，搬进新房。作为棚户区的一种特殊存在模式，在府南河综合整治之前的倒桑树街、染靛街，距3508厂宿舍东侧100米左右沿河一带，有十余家吊脚楼参差错落镶嵌其间。

旧时，一些临河建筑前面邻街，将后面一小部分伸向河面，用条石垒砌加固临河堡坎，伸入河中的部分使用木柱或砖、石柱子支撑，其上铺上木板，以增加房屋面积，成为吊脚楼，形成“江上楼、高枕锦江流”的独特景观，此乃南河一旧景。无须增加宅基地，只将河滩巧加利用，便可得“近水楼台”，这的确不失为南河人家的聪明之举。

虽然楼主一般都是平民人家，但一些精明的酒馆饭店老板却看好这吊脚楼隐含的“先得月”的水乡风情，在楼里开张做起了买卖。在此享用美味佳肴的确别有一番情趣：春秋之时，邀友二三，登斯楼也，推窗下望，则见流水潺潺，鸭儿上下游淌，翻腾戏水。笑谈中，把盏小酌，凉风拂面，好不惬意。待到酒酣耳热杯盘狼藉买单时，店家结账的方式也很特别，向来是以清点桌上盘碗作为计价的依据。于是有“恶搞”食客，大快朵颐之后，趁着店家不防，择其桌上空盘一二，迅即推窗抛入河中。算账时，店家虽疑窦丛生，却又不明究里，自认哑巴吃黄连。后，枯水期至，水落盘现，方才恍然，很是无奈。

吊脚楼风情美则美矣，但安全隐患却不可忽视。枯水季节的吊脚楼就像踩高跷的两只长腿站立在河滩上，悬吊吊地支撑着房子的一半；涨水的时候，灰黑色的吊脚楼犹如波涛当中的小船，给人以风雨飘摇的感觉。若洪水肆虐，则有楼毁人亡的风险。1981年7月12日夜，成都遭受了一



成都南河附近吊脚楼



场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望江楼水文站测得水位超过警戒线1.81米。险情刻不容缓，街办干部、民警、居委会成员全体出动，将吊脚楼居民悉数转移。那场特大洪水最终冲毁了安顺桥与枕江楼楼基石堤。所幸南河沿岸的倒桑树街、染靛街只是有惊无险，并没有遭遇灾难性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倒桑树街的改造与府南河综合整治同步进行，陈旧的吊脚楼也在被拆除之列。倒桑树、染靛街靠南河边所有民房全部拆除，被新建的高楼取而代之，显出一派崭新气象。沿河的吊脚楼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成为吊脚楼老居民心中的历史记忆。

虹桥旧事

倒桑树街街北南河上，有一座名为虹桥的单拱人行桥，桥西边是一棵树龄已逾200年的皂角古树。现在的虹桥建成时间不长，但这一地段建桥的历史却由来已久。《华阳国志·蜀志》中关于“李冰造七桥”、万里桥“西上曰夷里

桥，亦曰笮桥”的记载表明，这个位置极有可能就是李冰开成都二江所造七桥之一的笮桥（即索桥）的位置。倒桑树街的索桥自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毁于何时则于史无证。在索桥消失后的几十年中，当地居民过河全靠渡船。

渡船过河少了过桥的便捷，在南河冬日枯水时，船家就在河两边垒几块大石，上搭木板以作栈桥，这便是很简陋却中用的渡船码头。乘船过渡，船儿荡悠，两岸景物，回清倒影。到了夏日丰水时，水大浪涌，摆渡艰难，艄公则将一根酒杯粗的长纤绳一端固定在岸边古树粗大的树干上，另一端死死套牢船桅。如此，纵使江水湍急，船儿也不会被急流冲打的老远。有纤绳牵引，艄公更为从容不迫、舒卷自如，手持长长竹篙，左右摇摆，让一叶扁舟乖乖地驶入纤绳在江面上划过的那道弧线轨迹，准确无误地漂泊游弋于两岸码头之间。乘船一次只要一分钱。据说3508厂的家属职工往返于倒桑树街的宿舍区至

文庙西街的厂区，乘渡船是不给钱的，上头有人统一买单，其真假无从得知。

20世纪70年代，3508厂自筹资金在渡船附近设计修建了成都市区唯一一座吊桥，桥长53米，宽2米，结构类似于都江堰的索桥。自打有了吊桥起，也就没了摆渡船。后来在府河、南河的综合整治工程中拆除索桥，在原址新建一座单拱人行桥，名“虹桥”。而见证变迁的皂角古树周边环境也有了改善。绕树筑有圆坛，坛高1米5，坛径约10米，坛之东西各为5级石阶。坛侧石壁刻有行草“古树作证”四字，且有20世纪50年代原址老照片。坛西有小广场、独柱亭各一。坛周，花木葱茏，绿草茵茵，镌刻着古诗词和温馨话语的各类石头点缀其间。

如今，时过境迁，桥拆了又建，人来了又走，只有那棵百年古皂角树依然屹立在南河岸上，见证着南河的沧桑。

名副其实的肥猪市

从南门大桥向南，在浆洗街与洗面桥街接口的西边，就



是肥猪市街。过去这里属于城乡结合部，是成都南门一带主要的生猪市场与屠宰生猪的地方，故而称为肥猪市街，旁边还有肥猪市横街。改革开放之初，这里还有食品加工厂，后来改建为新式的居民楼。肥猪市横街已经被拆除，肥猪市街经过改造之后至今还在，向西一直通到武侯祠横街。

肥猪市较骡马市、羊市街、草市街的功能保持得更久，早在清朝末年这里就是极为有名的肥猪交易市场，也是锦城内外数十万人的猪肉副食来源地之一。那时的猪市主要是销售供屠宰的大猪，是名副其实的肥猪市场。肥猪市占地几十亩，有圆形的长廊，廊上有瓦，可以为入市的人们遮阳避雨。廊的内侧，用碗口粗的杉木做栏杆，穿于大柱上，既防止猪乱跑，又防夜间杉木被盗。被看中的猪，进入讨价还价阶段时，买卖双方就入场坐在杉木栏杆上磋商，久而久之，木料被磨得亮光光、黄澄澄，成为一道景观。这里每天进出的生猪有千头左右。每逢场期，邻近的双流县、新津县、邛崃县等周边各地的农

或猪贩子把肥猪捆起，用鸡公车或架架车运到这里来想卖个好价钱；城内养猪的人家，不想宰杀的也可以到这里卖了肥猪买肉。往往当天送来的猪，第二天一大早

就变成鲜肉挂在四门的肉架上了。

20世纪50年代，随着城市城区的不断扩大，从城外到肥猪市越来越远，加上肥猪市处于城内小巷，交通不便，来此交易肥猪的农民逐渐减少。农业合作化时期，肥猪由集体饲养，这里就再无肥猪交易。今肥猪市早已不存，仅余地名，余下老成都的一段回忆。

下力人的大餐

卖杂菜是20世纪40年代武侯祠大街的一道风景，售卖时间是下午三时左右，杂菜的来源是当地三所住宿学校及兵营食堂的残汤剩菜。用一只只大桶盛来，不论个而论勺卖，下力的穷苦人打回去，再加菜加水煮上半锅，全家人的美味晚餐便解决了。

还有一种廉价大餐是在浆洗街通往凉水井的路边，有两间专卖牛杂碎的铺面，每天从不远处的杀牛巷拉回几百斤牛

血、牛肠、牛肺等所谓下杂，切成小块加上萝卜和花椒、海椒等作料红烧，大烟滚滚、香气四溢，一个铜板可买一大碗干饭（俗称帽儿头）和一大碗牛杂碎，既饱了肚又解了馋。食客主要是板车夫、黄包车（人力车）夫、叫化子等。卖完一锅又煮一锅，生意奇好。

食客都是饭后付账，但就这样低廉的盛宴，还是常常有人吃不起。随时有未找到雇主的苦力、未讨到钱的叫化子饿慌了吃顶板凳的事发生。



顶板凳是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一种惯用惩罚方式，由店主实施，苦力承受，也算是一种民间风俗了。那时人也老实，吃饱了没有拉伸一趨子开跑，而是实话实说没有钱，认承顶板凳受罚。板凳为五寸宽、五尺长、一寸厚之实木板双人凳，被罚者跪于当街店外，无论夏日炎炎，还是秋霜冬雪，头顶木凳，直到有善人代付饭金始得免除。如果到收堂都没有解困济危的好人出现，则被毒打一顿赶走了事。





体现历史文态的内江“十贤坊”

□ 刘德元

地处成渝之心的四川省内江市，是一座有着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省辖地级市。常璩《华阳国志》载：“汉安县郡东五百里，土地虽迫，山水特美，宜桑蚕；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一郡丰沃。”常璩所说的“汉安”，便是今天的内江。内江人向以“汉安文化”自诩，历史上亦出过不少名人。例如被当今内江人公认的一师（苌弘）、二相（赵雄、赵贞吉）、三状元（范崇凯、赵逵、骆成骧）、四大家（喻培伦、张善子、张大千、范长江），便是汉安文化一脉

传承下来的佼佼者，为当代所推选出的内江“十贤”。“十贤坊”则是保护和承接历史记忆和人文信息、富含汉安文化底蕴、感受历史与未来对话的文化建筑。

化碧殿：沉吟碧玉良臣血，景仰高山至圣师。

化碧殿内供奉的是孔子之师苌弘。苌弘字叔，周代著名学者、政治家、兵阴阳家，通晓天文、历法、数术，精于音律、乐理。周灵王、景王、敬王三朝重臣。敬王时因参谋迁都辅佐兴邦有功，升任内史大夫，执掌朝政。孔子30岁前

后曾访问苌弘，请教和探讨礼仪和“乐”方面的知识。前492年，周敬王听信谗言，派人追杀苌弘于蜀，蜀人藏其血，三年化为碧。历代以“苌弘化碧”“碧血丹心”褒扬其忠烈。

为了追祀这位汉安历史上第一位先贤，特按周代建筑宫室台榭模式，以阶梯形夯土台为核心，以中轴线上最高的王堂为构图中心，倚台逐层建仿木结构屋。其建筑特征为：仿木梁架的结构体系，由屋顶、屋身、基座组成的单体造型，屋顶在立面占的比重很大。整

组建筑规模宏伟，均齐对称，中心突出，主次分明，既反映了周代宗法社会结构的清晰、有序和朴素，也体现了周代建筑的主体风格。

梧岗居：凭倚名山百丈；邀来皓月三分。

梧岗居距化碧殿约300米，浅草青石，花香满径。为纪念内江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范崇凯而建。范崇凯，字金卿。唐开元四年（716）以一篇《花萼楼赋》获得唐玄宗嘉奖，钦定为天下第一。可查的历史记载有明代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其卷二“历代状元条”下称：“唐宋以来状元科第姓名可考者……开元四年进士十六人，状元范崇凯……”。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第五卷第184页载：“开元三年乙卯进士十六人，范崇凯为状元。”此外，民国《内江县志》中还记载“范元凯，崇凯弟，自负其才，以诗赠其兄。明皇奉九成宫，凯赋诗三步成章。”本地人重视其二人弟兄双双中第的才华，赞誉为



梧岗居

“梧冈双凤”。明代内江十二景中，便有了“花萼春晖”一景，即两兄弟的家乡花萼村。

关于范崇凯和李太白的友谊，有许多传说，也有许多文史专家的考证辩驳。据明代状元杨慎考证，李白曾有《送友人》一首，乃是他送别内江友人范崇凯时所作。

唐代建筑风格的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开朗。梧岗居仿木建筑反映了唐代建筑艺术加工和结构的统一，斗拱的结构、柱子的形象、梁的加工等都令人感到构件本身受力状态与形象之间内在的联系，达到了力与美的统一。屋顶舒展平远，门窗厚重雄浑，给人以庄重、大气和开阔的印象。而大红大紫的主色调，更加显示出唐开元年间的富贵和笙歌燕舞的繁荣。

雄云阁、逵元轩：天子门生，重文长笛三弄；东坡小雅，辅政制策万言。

逵元轩和雄云阁分别是为纪念南宋天子门生赵逵和抗金名相赵雄而建造的仿宋代建筑

群。二位宋代先贤合祀一处，联袂打造，在充分体现宋代建筑风格的同时，也展示了二位先贤的卓尔不群。

赵逵，字庄叔，号栖云，资中人。宋高宗绍兴二

十一年（1151）辛未科状元，官至中书舍人，以刚正不阿著于世。《宋史》评其“皆一时之良，为秦桧所忌，而不挠者。”赵逵工诗善文，高宗称其文“气魄恢宏似苏东坡”，故时人雅称“小东坡”，著有《栖云集》三十卷、《赵逵文粹》十七卷。今资中县境内尚有状元街、栖云楼、状元祠、状元亭、状元井、洗墨池、状元故里坊及其读书遗迹重龙山永庆寺、来鹤亭等。

赵雄，字温叔，资中文江渡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省试第一，历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尚书、端明殿学士、宁武军节度使、江南西路安抚使、右丞相等职，进卫国公、赠少师、谥文定。乾道六年（1170），曾以翰林学士身份出使金都，舌战金世宗君臣。晚年还乡，发展蚕桑，理财清政，捐资筑建春门台星楼。绍熙四年（1193）病逝，墓葬资中文江渡回湾。资人将墓侧小河取名宰相溪，建赵雄故里坊、卫国文定公神道碑纪念，资中文庙乡贤祠内祀有“宋卫国文定公赵雄之位”。江苏吴县“韩世忠墓园”中存赵雄所撰13900字墓碑《韩蕲公神道碑》文，有遗著《赵雄奏议》二十卷存世。

雄云阁和逵元轩在建筑风格上，基本上参照了宋代建筑的主要特点，采用斗拱技术；





孟静斋

色彩上继承了唐代大红大紫的主基调；用材上以钢筋水泥仿木料为主，兼以砖石；雕饰题材上凸显勾栏瓦肆，有人物、动物、植物、几何纹、云气等图案。游人步入其中，观木雕、望江景、访古韵、赏书画、品茶艺、论茶道，别有韵致。

孟静斋：阁中韵事怀贞吉；芹泮文风振汉安。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内江三堆山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隆庆年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兼管都察院。曾任天子日讲官。嘉靖“庚戌之变”和“隆庆和议”中，表现出刚正的爱国主张和杰出的政治才能。晚年乞归回乡，在桐梓坝建狮山山房授徒讲学，引禅悟，致良知。其文集卷1至6是诗集，卷7至23是文集，收文266篇，有章奏、讲章、送序、书序、寿序、记传、哀祭、碑志、书启、箴铭、赋等。

孟静斋的建筑风格更为凸显明清建筑的复古取向，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化，突出了青砖灰瓦同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

清漪楼：抖起精神触落满天星斗；长成羽翼冲开万里云霄。

骆成骧，字公骕，资中舒家桥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殿试以“整军、治贪、节约、水利”四项策对，被光绪钦点为状元。骆成骧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他秀才是案首，举人是经魁，进士是状元；他是大清王朝267年里114名状元中唯一的一个四川人。骆成骧一生清廉自守，为人坦荡光明，不求高官厚禄。辛亥革命后，骆成骧出任过四川临时议会会长、都督府顾问、四川筹赈局督办、四川高等学校（今四川大学前身）校长等职；他勤政廉洁，家用贫困，厨灶屡空，有“穷状元”之称；他的狷介人生，流辉溢彩。

清代建筑基本承袭明代，墙体和瓦

檐突出清砖灰瓦的格调，挑檐饰以风铃、走兽或力神以辟邪。

疏影楼：疏影楼是民国时期内江四大家喻培伦、张善子、张大千和范长江特意打造的仿民国时期建筑精品。

培伦亭：震古烁今，掷弹砸平专制；开来继往，抛头换取共和。

喻培伦，字云纪，辛亥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喻培伦少年聪明好学，尤喜机械。16岁赴日本留学，专攻化学、医药等。1908年在东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为革命军的爆炸大王。1911年4月27日参加广州起义，胸挂炸弹，率先攻打两广总督府，受伤被俘，英勇就义。民国政府成立后，大总统孙中山追赠其为大将军，葬于广州黄花岗，并拨专款在故乡建祠纪念。著名川籍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喻培伦为国牺牲五十周年之时曾经写诗



疏影楼

缅怀他：“当时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人燕。几尺电丝难再续，一筐炸弹奋当先。成仁烈迹惊环宇，起义欢声壮故园。五十年来天下变，神州春色遍人间。”为我们生动描绘了一个英姿飒爽、英勇无畏、浩气长存的大将军形象。

大千亭：彩笔情生摩耶舍；丹青魂系大风堂。

张大千，名爰，字大千，生于内江市中区芭蕉井，与其兄共建大风堂。大千山水、花鸟、人物、走兽俱精。书法、金石、诗词、鉴藏、烹饪等皆有非凡造诣。其艺术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前期，从家乡四川进军上海北京，以师法古典为主，其中国传统国画艺术趋于顶峰，得“南张北溥”之美誉，徐悲鸿赞为“五百年来一人”；中期，以面壁敦煌石窟三年为转折点，甚得盛唐华彩大气的真谛，画风大变，后漂泊海外，多次办展，是将中国画推向世界的第一人，荣膺国际艺术学会金奖并被公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获“东张西毕”之盛誉；晚年，结束漂泊，定居台湾，川音不改，羁情浓浓，由师法古人、师法自然进入师法心源，大胆图变，开创泼彩泼墨的新画风。1984年，大千先生病逝于台北，当局以国葬的礼节将其安葬于“摩耶精舍”梅丘，并赠予“艺坛宗师”称号。

张大千二哥张善子，号虎痴。少年从母学画，曾拜李瑞清门下。1917年与大千一道东渡日本，回国后与大千同寓上海，有“二雅”之誉。精鉴赏，富收藏，并与黄宾虹、马企周等八人组织烂漫社。游历名山大川。抗战时旅美举办画展，组织募捐。返国卒于重庆，年仅59岁。张善子作品精妙沉雄，尤著神韵。其代表作《金陵十二钗图》各摘《西厢记》询句题之。如“临去波那一转”“怎不回过脸来”“终日价情思睡昏昏”等以寓美人猛虎之意，独具匠心，堪称白眉。

长江亭：畅谈竟夕窑中对；史笔千秋塞上行。

范长江，原名范承甫，字希天，内江田家镇赵家坝人。26岁时，以范长江笔名写作，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创造了现代中国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第一人、揭示西安事变真相第一位和报道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一人。范长江1938年创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苏皖鲁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

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等职，是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0年10月23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为表彰范长江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的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国务院将中青社成立的时间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融入了西方特色，更加包容扩大，形式简约，造型典雅。疏影楼参照了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和园林艺术结合的造型，给人以开放包容而又雍容典雅的气派。在镶嵌青砖地面的庭院里，配以民国四大家铜像，让人肃然起敬。

著名史学家、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言：一座城市凝固一个民族的历史，一栋建筑浓缩一个时代的辉煌。在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要特别重视这些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做好研究和保护、维护和再现。内江十贤坊，就是对历史文化载体和文化思想重建的具体体现。

（作者单位：内江市史志办公室）



记参加诺曼底登陆作战的邻水人姜瑜

□ 丁禹强

少有大志，投考军校救国

姜瑜，名英光，字瑜，1913年出生，四川省邻水县双龙乡（今龙桥乡）姜家大石坝人。1930年，年仅17岁的姜瑜从成都中学毕业，有感于国家多难，外敌猖狂，内乱频仍，乃立志投考军校，期望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同年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央军校第八期。姜瑜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33年，作为18名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被选派进入南京电雷学校第一期学习航海专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姜瑜任海军江防司令部快艇大队文九三艇艇长，设防于江阴要塞，抗击日本海军进攻。后调任文三艇艇长，驻防马当要塞，抗击日军。又调任岳三七艇艇长，在广州洋面打击日军。因上司欧阳格追究马当要塞失守责任，姜瑜被迫离任，到万县要塞司令部训练新兵。

留学英伦，参加诺曼底战役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旨在加强海军建设的特别会议。会



参加诺曼底登陆的21名中国军人

议决定模仿清朝的模式，派遣一批精英出国留学，为以后海军发展做好准备。随即，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筹备处通过严格筛选，在上千名海军军官中挑选了85人，其中60人去美国，25人去英国，姜瑜名列其中。

1943年6月，去英国学习的25人辗转三个月才到达英国。其中有4人被分到朴茨茅斯轮机学校学习轮机专业，而有百年悠久历史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则为郭成森、姜瑜等21名中国留学生专设了一个“中国班”，一切按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要求训练。学习和训练一段时间后，英国皇家海军

根据战时需要，将他们派往各个战区，到现役大型军舰上实习。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打响，在英国海军参加实习作战的郭成森、姜瑜等21名中国留学军官悉数参加了战役。

在整个诺曼底登陆过程中，这些中国军官或在巡洋舰上、或在驱逐舰上，还有的在战列舰上和航空母舰上，作为诺曼底作战的普通一兵担任了主攻和掩护任务，自始至终参与了这次伟大的作战行动。

据郭成森的儿子郭孝情回忆：“我父亲和卢东阁、黄廷鑫、王显琼、姜瑜、白树绵、

牟秉剑、郭灯华8人是直接到诺曼底一线参战。打完诺曼底战役之后，他们后来还随英国军舰去挪威附近的北海海域执行布雷和护航任务。”

出长“伏波”，台海殉难

1946年1月，国民党海军接收英国皇家海军赠送的护航舰1艘，命名为“伏波号”。

在接收时，该舰舰长为福建人柳鹤图，姜瑜作为少校副舰长参与接收英国赠送的“伏波号”军舰（原英国海军Flower级巡逻舰 Petunia号）。移交典礼在英国普利茅斯港举行，由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中将代表接受，命名为“伏波”军舰。“伏波”军舰于8月8日启程返国，经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宣慰槟榔屿、新加坡等地华侨，于11月11日驶抵香港，在舰上举行庆祝酒会，由舰长柳鹤图少校主持，赴英国接“重庆舰”及“灵甫舰”的海军官兵，甫乘澳洲皇后号邮轮抵达香港，亦参加了酒会。在泊港期间，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中将手令姜瑜海军少校取代柳鹤图少校为舰长，舰上官兵三分之二部分亦被更换。12月16日驶抵南京，为中华民国海军第一艘防港舰。

不幸的是，伏波舰于1947年3月19日夜在澎湖海面与招商局福建轮（一说闽海号）相撞沉没，舰长以下130余人均遭灭顶之灾。仅轮机长



伏波号

（一说机炮副）焦德孝受姜瑜命令生还具报。

“伏波号”沉没原因，现在仍有许多谜团，民国《邻水县志》对此记载：“（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台湾事变上闻，瑜奉令绥靖。以三月十九日驶至福建龟屿岛海上，浓雾飓风怒号激荡，讫夜午不息，遽与招商局闽海号巨轮相撞，轰然作奇响。瑜初疑触礁，历检舰身，既见舳尾尽断，急发警笛电讯求援。闽海轮畏祸，仓皇引去。深夜亦无他轮驶过洋面。凡十五分钟，伏波号全舰沉没。瑜率全舰官兵一百六十余人殉焉。临事一准大不列颠皇家海军通例，唱名整队毕，口授遗嘱，以机炮副焦德孝驰归具保，重职守也。并世海员尽伤之。瑜之死，年三十四”。

姜瑜少年聪颖，青年早达，中年早殇。妻子熊曼君，1916年生，邻水县长滩乡

人，成都光华大学肄业。夫妻二人育有一女，名丹屏。姜瑜殉难后，国民政府海军部将熊曼君安排在海军服务社工作，女儿丹屏生活由国民政府全包。解放后，熊曼君回到邻水县百货公司工作，后调达县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工作至退休，2002年在上海去世。姜丹屏先后在邻水二中、邻水中学工作，现居上海。

历史岂能遗忘，血泪演绎传奇。承蒙国民党高官桂永清器重，姜瑜以英杰盛年，担此“伏波号”舰长重任，而命途多舛，遽临大难。作为军人，没有浴血疆场，而殇于海难，想姜瑜英魂有灵，定当死不瞑目。综其一生，长江抗日寇，欧洲战纳粹，功绩昭彰，青史不没。

（作者单位：邻水县地方志办公室）



怀念张善子先生

□ 陶世琼



张善子、张大千昆仲切磋画技

善子先生，1882年5月出生于内江县象鼻嘴堰塘湾。1899年，18岁的他参加了余栋臣领导的、后来被史家称为“大足教案”的武装斗争。

1905年，24岁的张善子东渡日本留学。在此期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中华民国建立后，张善子

被委任为四川陆军第二旅少将旅长，参加了熊克武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战争失败后，同著名书法家余切（公孙长子）亡命日本，并开始钻研绘画艺术。1917年先生回国，并带回幼虎作写生对象，专心画虎，以虎的威猛和气势来激励国人。“虎痴”之

名大振。先生与其八弟大千共同侍奉曾熙和李瑞清为师，学习画艺和书法，兄弟俩合作作画。

1933年，先生与大千阖家迁入苏州网师园，饲养幼虎“虎儿”作临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以社会名流身份，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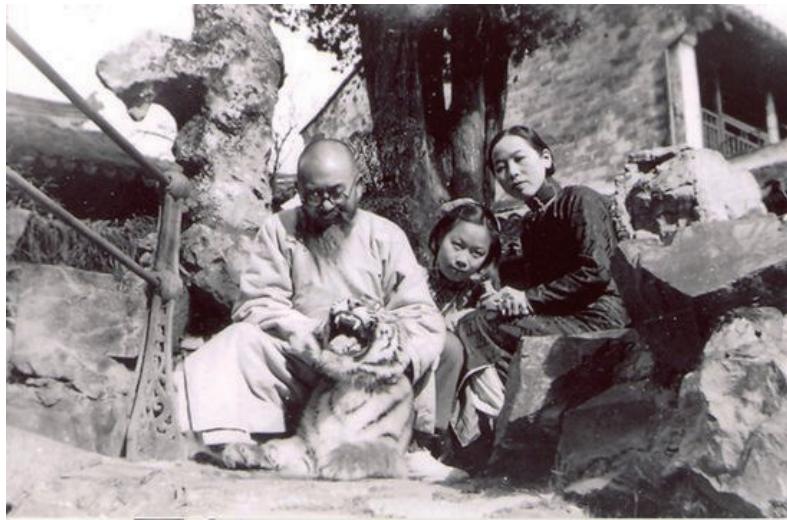
议，共商抗日大计。先生作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国》，画中以28只猛虎（代表当时我国28行省），一齐扑向一轮落日（象征日本），表达全面抗战的决心。还作了《飞虎图》《火牛破阵图》《正气歌像传》《弦高犒师》《卜式牧羊》等，到各地作巡回展览和抗日动员。

虎，在中国被称为“百兽之王”，又被尊为“山君”。俗话说云从龙，风从虎。虎要出行，山风呼啸，草木摇落；虎发吼声，群山震荡，百兽伏慑。先生正是以虎的威猛和气势，来鼓舞中国人民抗战斗志。

1938年6月，在先生的主持下，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湖北武昌成立，先生被选为首任常务理事、研究部主



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国》(局部)



张善子及家人与“虎儿”合影

任，并兼宣传部及出版部的职务。

1939年12月，先生受政府委派，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名义，出国谢赈、宣传，进行国民外交活动。他取道越南赴法国再辗转美国。在欧、美所到之处，都举办画展，进行义卖，为抗战募捐，同时宣传中国的正义立场，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赢得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国际支援。法国总统勒白伦亲往参观展览。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废除《美日条约》。为答谢美国政府的正义立场，先生挥笔作《虎图》二幅，分别赠送给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罗斯福总统夫人曾几次开车迎接善子先生到白宫欢宴，表示答谢。

先生还到欧美一些大学和华人团体进行演讲，宣传抗

日，车子所经之处，常有人在车外竖起大拇指对善子先生高呼“Tiger Master”（老虎大

歌乐山宽仁医院，享年59岁。

先生在国外将义卖、展览门票及募捐所得，及时汇回国作抗战经费，涓滴归公，不入私囊。回到香港后，竟然囊中空空，无返渝旅资。他在国外汇给政府的钱，达二十多万美元，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先生死后，极备哀荣。欧、美许多城市及华侨团体纷纷举行追悼会。国内各媒体发表不少悼唁文章。11月，重庆举行了公祭和盛大的追悼会。政府党政军要人纷纷表示悼唁。蒋介石表示“先生之卒，尤深珍惜”。于右任挽



工作中的张善子

师）表示对先生的友善和尊重。

1940年10月，先生动身回国，抵达重庆后，由于在国外积劳成疾，糖尿病复发，10月20日，竟溘然长逝于重庆

联：“名垂宇宙生无忝，气壮山河笔有神”。何应钦挽联：“正气磅礴谢皋羽，余事丹青顾虎头”。张治中挽联：“载誉他邦，画苑千秋正气谱；宣劳为国，艺人一代大风堂”。





羌族风情

□ 陈康

美丽而神秘的岷江上游两岸，生活着一个十分悠久古老的民族——羌族。他们主要聚居在汶川、茂县、理县、北川等县的高山峡谷之中。勤劳勇敢的古羌人，不仅以其独特精湛的建筑技艺闻名于民族之林，而且以其精美的挑花刺绣

与能歌善舞著称。

羌绣

地处四川省西北高原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该县羌乡山寨的羌族妇女们历来就有挑花刺绣的技艺，申报的“羌绣传统刺绣工艺”于2006年被批准为第一批四川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被列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绵虒镇羌峰村还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羌绣之乡”。

早在明清时期，羌族的挑花刺绣就很盛行，不乏佳作。羌族妇女们在劳动生产之余，挑针走线，制作出了许多独具匠心的羌绣制品，其中尤以花围腰与云云鞋最为有名。她们在挑花刺绣时，既不打样，又不划线，全凭娴熟的技巧，信手挑绣成绚丽多彩的各种几何图案或花卉麒麟，其题材大多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物。如植物中的花、叶、瓜、果；动物中的鹿、狮、马、虫、鱼、飞禽及人物等等。表



现手法上，既有实写，亦有变形，所挑绣之景物，皆秀丽精巧，多含吉祥如意，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美好憧憬。如“团花似锦”“鱼水和谐”“蛾蛾戏花”“云云花”“刮瓞绵绵”“骏马图”“麒麟呈祥”等等，多达数十种。针法除采用挑花外，尚有纳花、纤花、链子扣、平绣等。挑花精巧细致；纤花和纳花显得清秀明丽；链子扣则刚健淳朴、粗犷豪放。色彩以黑白对比居多，且多用锦线，显得朴素大方，清爽明快。也有用色线挑花，有的飘带全是彩线分条排列，采用纳花针法，如五彩霓虹，绚烂夺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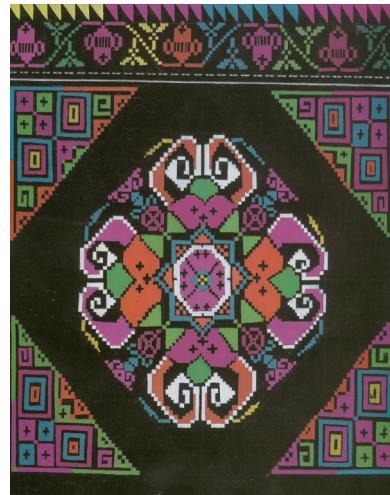
羌族挑花刺绣的纹饰图案，是在继承古羌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羌族妇女服饰的领口、袖口、衣襟、托肩等



处的花纹，既是姜维城遗址出土的彩陶片纹饰的变异，又与石棺葬文化中陶罐口沿下颈部与肩部之装饰压印纹极似，故被直呼为“缸钵边”。羌族男青年的三角肚兜（俗称肚子）上的纹饰，与龙溪出土的西周酒器“青铜罍”上的“饕餮”纹饰文化内涵一致。羌族妇女围腰上的方形组合纹饰彩绣图案，其用色及图像与敦煌莫高窟之唐代壁画“藻井”无异。

羌族的刺绣纹饰图案不但生动，且寓意深刻。如：牡丹象征幸福；瓜果、粮食象征丰收；鸟巢象征喜庆；狮、猫等象征欢乐；鱼、龙象征吉祥。刺绣图案中心的纹样叫“团团花”，为圆形组合；升子印为大方形组合；一颗印为窄边纹样组合；火盆花为宽边大方形团花；角花与边花纹样，有长条形的吊吊花、灯笼花、方格子、万字格、八瓣花、缸钵边等等，对中间的团花起着陪衬与烘托的作用。

羌族挑花刺绣作品的装饰性很强，妇女的围腰、衣襟、袖口、头帕、枕帕、钱包、香包、鞋垫、腰带等等，随处可见。究其装饰之部位，均系易损处。既有美化之功能，又借助密密麻麻的针脚，增强衣物的耐磨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不仅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收



藏价值。

精美的肚兜、香包、头帕、鞋垫、云云鞋等刺绣作品，不仅成了羌族青年男女定情的信物，而且已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艺术品。尤其是云云鞋，精美漂亮，如“彩花凉鞋”“踩堂鞋”“满花尖尖鞋”“包包鞋”等等都深受各族群众喜爱。不仅美观，其来历还有典故。传说很久以前，汶川的一个海子里有位鲤鱼姑娘爱上了一位牧羊少年，她见牧羊少年那双生满厚茧的赤脚，心疼得快要裂了。她顺手撕来了一片天上的云彩，摘来一束海子边的羊角花给牧羊少年做了一双漂亮的云云鞋。后来，在羌族地方便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风俗，小伙子只要同姑娘恋爱了，就免不了要穿上一双美丽的绣有云朵的云云鞋，姑娘也必须做一双精致的云云鞋赠





与小伙子做定情信物。

1957年7月，羌峰村羌族妇女汪玉花刺绣的两幅挑花围腰送成都“四川省工艺美术品展览”获一等奖。1979年，雁门乡羌族妇女陈支文的刺绣作品挑花围腰《火盆花》及云云鞋，因其独具风格，工精艺绝，被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在中国第五届艺术博览会上，汶川县选送的作品“挑花刺绣精品”分获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大大地提高了羌民族的知名度。

“羊皮鼓舞”

在羌族众多的舞蹈中，“羊皮鼓舞”的历史最为悠久。

据文献记载：“羊皮鼓舞”原是羌族“释比”做法事时跳的一种宗教舞蹈，后演变

为民间舞蹈。“释比”也称“许”或尊称“阿爸许”，是一种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宗教师，他既是原始宗教活动的主持人，也是羌族文化艺术的传播者。几乎每一个羌寨中都有一名“释比”。诸如祭山、还原、安神、驱鬼、治病、除秽、招魂、消灾以及男女合婚、新生婴儿的命名，对死者的安葬和超度等活动，都离不开他们。释比仅限于男性充任，并可结婚成家。他们没有宗教性的组织或寺院，但要供奉历代祖师和“猴头童子”。

“羊皮鼓”

“舞”何以渊源流传、如此盛行？传说是天神阿巴木纳带了很多在各种祭祀场所用的经书，由于路途劳累，休息时他睡着了，醒来时，所有的经书都被一只山羊吃进了肚里，正着急时，树上的金丝猴对他说：“羊子吃掉了你的经书，你快杀掉山羊，用山羊皮制成鼓，做法事的时候，敲起羊皮



鼓，经文就会脱口而出。”此法果然灵验，阿巴木纳为感激金丝猴，在做法事的时候，就佩戴金丝猴皮帽。从此以后，释比们敬拜猴头师祖或做法事时就大跳“羊皮鼓舞”。

羊皮鼓，鼓框木制，单面蒙以羊皮，鼓框高约11厘米，鼓面直径38~40厘米，鼓框里面置有横梁。鼓身连在一个呈弓形的木把上，木把上端雕饰以羊头，下端拴系双丝彩穗。鼓捶用藤条或杉木制作（羌语称“尔握特”），呈勾形，长约58厘米，捶头缠以绸布，捶柄饰以彩穗。改革后的羌族皮鼓，单面蒙以双层羊皮，鼓框外表彩绘条形纹饰，鼓框周围装饰丝质彩穗。祭祀活动一般在每寨的神林中举行，由释比领舞，头戴插着野鸡翎羽和彩色纸条的金丝猴皮帽，手持铜响盘、神棍、彩旗等。舞蹈者在双膝不断地颤抖中，手持羊皮鼓，连续表演“持鼓绕头”“屈腿左右旋转”“旋摆髋部”等“商羊步”（俗称“禹步舞”或“跛子舞”）。释比口诵经文，经文分“上坛经”“中坛经”“下坛经”。比较著名的有反映人类起源的“木比塔造天地”、歌颂英雄的“迟机格布”，也有反映民族迁徙的叙事长诗“羌戈大战”。其余舞者跟随其



后，用皮鼓和响铃伴奏。整个舞蹈鼓声和铃声相交，动作敏捷、矫健、激烈，节奏明快，烘托出一种严肃紧张而又热烈的气氛。

“羊皮鼓舞”是羌族人民精神文化的一种体现，是研究羌族历史的重要资料，极具民族特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四川省歌舞团、阿坝州歌舞团、茂县歌舞团和汶川县“羊角花”业余艺术团曾编排一系列“羊皮鼓舞”节目，被中央、省、州、县电视台录播。“羊皮鼓舞”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是羌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羊皮鼓舞”舞姿灵巧、敏捷、粗犷，多为反时针方向围圈而跳。领舞者头戴金丝猴皮帽，左肩扛神棍，右手执铜铃。其他表演者手执羊皮鼓，人数一般为6—8人。由于鼓大而沉，舞动起来费劲，鼓的摆动是靠表演者身体转动，伴

以膝的上下颤动才得以起舞，形成独特的风格。

这种舞蹈一般无乐曲，无歌唱伴舞，凭着鼓点节奏，响盘敲击出的不同音响节奏组合而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汶川的“羊皮鼓舞”队多次上北京演出，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称赞。

近年来，随着“释比文化研究”与“藏羌锅庄”的普及，“羊皮鼓舞”在汶川县境内也更加广泛流行，尤以龙溪乡的阿尔村、巴夺村、马房寨和雁门乡的萝卜寨、月里寨以及绵虒镇羌峰村的舞蹈最为活跃。如果说羌族歌舞是一杯醇香的美酒，那么，咚咚咚的“羊皮鼓舞”便是一部经典的史诗！汶川县创作的羌族民间舞蹈“羊皮鼓舞”已被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作者单位：汶川县史志办公室）



我国修志历史悠久，修志环境与地方志事业发展息息相关。一个好的修志环境，有利于促进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反之则会造成影响或阻碍。发展包含两方面：一是修志工作的发展，主要指修志工作的开展、日常工作的运转；二是修志质量的发展，主要指方志学术的研讨、交流、理论创新与发展。

坚持官办官修，是推动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

自古以来，地方志书编纂始终坚持官办、官写、官审制度。从资料的提供、收集、整理、编纂、校对、审定、出版、发行等方面来看，编写志书、年鉴涉及面宽，工作量大，参与人多，故称“众手成志”，是项浩瀚工程。只有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工作格局，将地方志工作机构纳入政府序列，明确编制性质，下达工作任务，确定工作职责，并将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保障基本的工作条件，地方志工作机构和修志队伍才能得以稳定，地方志工作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才能在地方志编纂工作中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秉笔直书、直抒史实的原则。同时，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对三级志书审查验收制度的明确，也凸显了地方志官办官修的特点，确保了地方志作为官书的质量和权威。

党政高度重视，是推动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

目前，地方志工作在现实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编纂

修志环境对地方志事业发展的作用

□ 朱浩然

政领导认为地方志工作属于记录历史的文化事业，没有发展经济工作重要，总是把抓经济工作放在首位，以抓经济指标的上升、追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突出工作政绩为重心，对地方志工作或不闻不问，或不予支持。在部门认识上，均以自身工作为重心，对目标考核的硬指标、刚性项目非常看重，而对没有硬性考核分值或者分值比重较小的方志工作，持可抓可不抓、可落实可不落实的态度。

综上所述，地方党政领导若不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就会带动部门认识偏颇，产生弱势强势部门之分，工作难以推动；地方党政领导若不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方志系统干部交流、提拔就更加困难，无法调动工作积极性，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健康；地方党政领导若不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就无法保证地方志工作开展必须的经费，事业将陷入困局，停滞不前。

加大财政投入，是推动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的有效保障

就巴中市第二轮续（新）修地方志编纂出版情况而言，编辑进展参差不平。主要表现在：一是县（区）志至今才基本完成任务，且编纂整体质量不高；二是事业志（部门志）的编纂任务欠账太大，市、县（区）部门志编纂出版只占部门总数的30%左右，且差距较大；三是乡镇志、村志编纂

志书、年鉴以及其他地情资料时，征集资料需要地方党政出文，各相关部门或单位才会提供资料，予以配合。而地方志部门发的文，一些单位（部门）不按要求落实，或拒绝提供相关资料。如在编纂《巴中市志》《巴中年鉴》时，绝大多数单位不愿意提供资料，编纂工作举步维艰。

二是在地方志干部队伍培养选拔方面，长期以来，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人员被提拔或交流任职较少，政府组织专业人才培训或定向培养更少。

三是党政领导和部门对地方志的认识存在偏颇，有的党

出版情况较差，全市共188个乡镇（镇），4个街道办事处，2374个行政村，243个居委会，已出版乡镇志、村志的总数不到50部；四是专业志、特色志寥寥无几，不到10部，无法彰显地方特色。

造成各类志书出版数量较少，不能按时推进编纂任务的主要原因是：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地方财政无能力为地方志事业发展作足额投入。由于地方财政缺口较大，无法满足各相关单位志书编纂、印刷发行的基本费用，导致绝大多数单位无资金推进此项工作，欠账太大，甚至已经编纂出初稿的志书也因没有专项经费，未出版就夭折；由于没有专项资金，地方志工作机构无法正常举办方志业务培训班，无法培养出更多的专（兼）职修志人才，充实修志队伍；又因无资金去吸收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修志，导致现阶段修志专业人才紧缺，无法推动志书编纂出版任务的全面完成。

发挥方志学（协）会作用，是推动地方志理论发展的有效途径

方志学（协）会虽是民间组织，却是推动地方志学术研究、探索地方志理论体系创新发展的中枢机构。应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发挥其作用，广泛吸收地方志专业人士、业余爱好者积极参与，通过开展学术交流、志鉴评议、地方志理论研讨等活动，努力推进地方志成果转化，巩固和完善提

升地方志理论创新。但由于各地经济条件不一致，用于方志理论研究的经费也不平衡，导致部分地方地方志学（协）会开展活动无经费或依靠微薄的会员会费作支撑，或以会养会，形成保运转的工作方式。就巴中市而言，全市三县两区加市本级仅成立了2个方志学（协）会组织，入会人员也参差不齐，系统内入会人数不足80%；外界人士入会以领导居多，且几乎都为副会长职务，而他们不承担学（协）会具体工作任务，对地方志工作不熟悉，对事业发展不利。从活动开展情况来看，每年只例行召开1次年会，根本没有学术研究内容，局限性太大，导致学术理论体系无新的发展。加之地方志工作人员参与方志理论探讨、研究的积极性不高，整体业务素质偏低，而全国又无固定的理论教材为引导，只能通过实践探索学习，造成学（协）会在组织业务研讨、理论交流、人员培训方面困难重重。

促进全域修志，是加快地方志事业循序发展的唯一方法

修志工作有时段性、延续性，地方志行政部门应通过各种手段努力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将省、市、县三级志书和乡镇志、事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特色志等的编写任务纳入各年度目标考核体系，形成一种常态的工作机制，努力推动相关单位自觉按照要求落实并完成工作任务，

在一定领域内形成一种以先进促后进、以自觉促消极，你追我赶、齐头并进的修志格局，营造出良好的修志工作环境。

各地党委政府应利用上一轮修志结束的时机，大张旗鼓表彰奖励先进，通报批评后进。对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和事，要大力宣传，扩大宣传面，提高地方志工作知名度，促进修志任务全面落实。应以新一轮地方志启动为契机，加强组织引导，全方位安排部署新的工作任务。通过加强对修志人员的业务培训，努力促进各部门储备修志专业人员，确保全域内地方志工作有机制、有专（兼）职人员、有任务安排、有工作落实，努力推进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总之，要推进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离不开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离不开各级财政的鼎力支持与投入，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离不开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离不开热心、爱好地方志事业人士的努力和奉献，更离不开地方志专家、学者的深度研究与无私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方志理论成果，探索创新，营造出良好的修志氛围，推动地方志事业循序、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巴中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2003年7月24日，我国首部地方志工作法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经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地方志工作和地方志事业从此有了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部分省、市（州）、县（区）人民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地方志工作法规及其实施办法。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对加强地方志依法行政、依法修志，推动地方志工作顺利开展，促进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标志着地方志工作和地方志事业走向法制化轨道。

从地方志法律法规出台以来的实施情况来看，突出问题就是地方志部门依法行政、依法修志的力度不够、效果不佳。究其原因，除了地方志法律法规本身存在某些缺陷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对地方志行政执法和依法修志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地方志行政执法与行政管理混同 从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性质上讲，各市、县级地方志部门大都为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参照国家公务员法管理），按地方志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行驶依法监督权力，对地方志事业的管理着重于宏观决策，统筹

规划，监督指导。地方志行政执法的重点在于地方志法律法规的组织实施，通过法定程序，采取法律手段，查处违法行为，增强修志意识。然而，很多市、县级地方志部门将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等同或混同，没有真正按照地方志法律法规的规定，正确应用法律手段，有效推动地方志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出现执法力度不够、效果不佳、推动不力等现象。因此，在地方志事业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之后，地方志行政管理手段和法律法规管理手段应是相辅相成、协调配合的关系。地方志部门应合理应用两种手段，切实履行组织协调指导和执法监督两种职能，使地方志事业沿着法制轨道健康持续发展。

地方志行政执法“软”与其它行政执法“硬” 有些人认为地方志法律法规“软”，不如刑事、档案、保密等其它法律那么“硬”，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和责任追究，地方志执法难以实现。还有人认为，执法是司法部门的事，跟地方志部门毫无瓜葛，因此看重的是其它行业执法，而轻视地方志行政执法。

地方志行政执法不力与地方志法律法规不完善 在实际工作中不难发现，由于地方志法律法规还存在某些缺陷，给

地方志行政执法的误区及对策

□ 李宣德 李超

依法行政、依法治志带来诸多不利因素。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做到“一纳入、八到位”，一些部门拒不依法编修部门志书或拒不向方志部门提供相关资料，这些行为应追究什么样的行政责任，给予什么处罚，地方志法律法规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自然达不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效果，制约和影响了地方志依法行政、依法修志进程。

要走出地方志行政执法的误区，充分发挥地方志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应做好以下工作：

加大宣传力度，解决认识偏差的问题 地方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布，为地方志部门提供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志的法律依据和“尚方宝剑”。一定要利用好这一法律武器，全方位、多渠道做好地方志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通过宣传，增强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级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政府法制办、省志编委联合开展地方志执法调研

领导对地方志工作的认知度，提高社会地位，扩大社会影响。切实履行好法律、法规赋予地方志部门的权力和义务，加大违法查处力度，强力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志进程，努力开创地方志工作的新局面。

建立执法队伍，解决执法水平的问题 地方志部门作为地方志法律法规的执法主体，要尽快组建执法队伍，将思想作风好、业务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干部，调整、充实到执法队伍中来，壮大执法队伍；要与政府法制部门密切配合，通过举办执法培训班，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和执法水平；可尝试建立地方志执法

监督员体系，规范执法程序，加强依法行政。

三个纳入，解决依法行政的问题 地方志工作要实现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持，政协参与，地方志工作机构具体组织实施，各承编单位众手成志”的工作格局。只有走依法

治志的路子，地方志工作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地方志部门应按照地方志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将地方志事业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地方志

工作纳入政府年度重点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将地方志法制建设纳入依法治理总体规划中，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抓落实；要高度重视行政执法工作，将地方志执法检查列入议事日程，当作大事来抓，特别在人员配备、经费保障、依法行政上多做文章，多下功夫。地方志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好、自觉维护好、带头执行好地方志法律法规，人人争当学法、守法、执法的模范，全面推动和有效促进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

制定实施细则，解决法律缺陷的问题 对地方志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应结合各地工

作实际，针对实施中的难点和阻碍，制定出可操作、易掌握的实施细则，并根据实际发展的形势变化及时修订，确保地方志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尤其是对违反地方志工作法律法规规定应承担行政和法律责任的，如少数单位或部门无故拖延或拒绝向地方志部门提供相关资料或提供虚假材料的、在志书编修过程中泄露国家机密的等等，这些具体违法行为如何处置应有一个统一的法律界定和执行标准。否则，地方志依法行政、依法治志将难以实现。

地方志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必须牢固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严格执法，敢于碰硬。发现一件，查处一件，通过对违法行为的查处，真正起到查处一件、教育一片的执法效果。同时，也要研究执法方法，结合部门特点，发挥部门优势，抢时机、分阶段、多形式、有重点地开展执法工作。此外，还要依靠人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善于执法，善于应用法律手段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讲究执法的实际效果，使地方志执法工作始终沿着依法行政、依法治志的法制化轨道不断前进。

（作者单位：平昌县地方志办公室）



《波茨坦公告》的时代意义

《波茨坦公告》又称《波茨坦宣言》《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是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上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的一份公告，主要内容是声明三围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等对战后对日本的处理方式的决定。《波茨坦公告》对战后日本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直到今天，公告精神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日本安倍政府持续右倾化，推行所谓“正常国家化”道路的情况下，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急需重温这一精神。

《波茨坦公告》的签定及其主要内容 1945年7月17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发表对日最后通牒式公告。由美国起草，英国同意。中国没有参加会议，但公告发表前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苏联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后加入该公告。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并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

这一塑造东亚战后和平秩序的重要文件共13条。公告表示，三国强大的武装力量将



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

在所有联合国家支援下，继续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并警告日本如不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即将如德国一样迅速完全毁灭。公告要求战后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惩办战争罪犯，消除阻止日本民主趋势之复兴和增强的一切障碍，取消日本的军事工业。公告重申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精神，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同盟国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并确定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对日本的指定地点实施占领，一旦达到本公告提出的各项目标并建立了能表达日本人民的意志、倾向和平的负责任的政府后，同盟国便当即撤走全部占领军。

国际社会应坚守的重要准则 随着时间流逝和历史意识

的缺失，《波茨坦公告》所建立的战后秩序在日本正在受到忽略，一些日本右翼势力总是试图弱化甚至抹杀公告的作用和影响，突破战后体制，这让日本重蹈二战覆辙的危险性正在增大。

安倍自上台后频出右倾言论，修改和平宪法，企图取消和平主义理念，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试图解禁集体自卫权，势必要破坏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而一些日本同盟国为了自己利益放纵日本，给整个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历史问题已成为这些年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在设法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格局，改变战后日本和平道路的基本走向，因此导致当前中日关系的紧张。

当今东亚国家关系处于波

动中，其中很重要原因是日本没有严格恪守公告原则和精神，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因此，此刻重新审视《波茨坦公告》精神是国际社会应坚守的重要准则，对更好维护东亚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现实意义和法理意义
《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原则，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际社会要以史为鉴，共同捍卫国际法秩序，共同维护东亚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今年是《波茨坦公告》发表70周年，抚今追昔，这些凝结着人类反法西斯战争最直接、最重要胜利果实的铮铮宣言，依然闪耀着正义和公理的光芒，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在地区格局风云变幻的当今，维护《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确定的历史正义，捍卫来之不易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成果，意义深远而重大。

《波茨坦公告》是钓鱼岛归属中国的重要依据。《波茨坦公告》连同1943年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等国际法律文件，构成了日本必须归还中国钓鱼岛的国际法基础。对此，日本政府在1945年发表的《日本投降书》中明确接受，并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承诺坚持这一立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

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895年4月17日，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被迫与日本签署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钓鱼岛等作为台湾“附属岛屿”一并被割让给日本。1941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宣布废除中日之间的一切条约。《马关条约》理所当然作废。1943年12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初露之时，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明文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对日最后通牒式公告《波茨坦公告》。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明确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承诺忠诚履行公告各项规定。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中国历史管辖实践看，钓鱼岛一直是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日本必须无条件归还其窃取的所有中国领土。上述文件还对日本领土范围作了明确界定，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

近些年来，日本试图非法占有钓鱼岛，实质是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法律文件所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严重违背了日本应承担的国际法义务。

对于中国而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重要文件从国际法上确认了台湾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神圣领土，是我国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国际法依据。

《波茨坦公告》拥有至高无上的国际法权威，保证了东亚地区从战乱走向和平、从衰落走向繁荣。但是，日本政府总是罔顾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其恶劣行径充分暴露出对侵略历史不反省、对战后秩序不尊重、对地区稳定不负责任的扭曲心态。如果日本不对照历史的镜子反省自己，一意孤行地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将永远走不出历史的阴影，日本同亚洲邻国的关系将没有未来，最终只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波茨坦公告》既是为了推动各国共同维护其所确定的战后国际秩序，也是为了敦促日本政府“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这是用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也是二战后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保证。中国愿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携手，维护二战后确立的和平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

(本刊综合)



追忆抗日爱国名将潘文华

□ 潘夕潮

灿地金花 扶将来四邻父老
冲霄剑气 收拾起半壁河山

潘文华将军是民国时期川康地方实力派军政首脑人物之一。他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一个贫苦的塾师家庭，六岁丧母，十五岁失去父亲，十六岁便参加清末时期的新军，从此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在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活中，潘文华从一名普通的士兵逐渐成长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的高级将领，每当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潘文华将军总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站在时代的前列，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以中国前途为重，以川康两省人民的福祉为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突破重重障碍，历尽艰难险阻，投身于国家民族的洪流中，将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融入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宏伟事业中。

从参加同盟会，响应武昌起义，到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从请缨出川，奔赴抗日前线，到指挥保卫南京前哨战；从团结川康、联合中共、防蒋图存，到反抗蒋介石政权，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潘文华将军凭着一

颗热爱国家、忠于民族的赤诚之心，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早在 1908 年，潘文华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求学时，就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启迪，与同学中的志士仁人一起秘密加入同盟会，冒着生命危险，开始反清革命活动。在秘密小团体的金兰谱序中，他们写有“炎黄华胄，岂戴胡儿天子”等激烈反清辞句。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正率部远征雪域高原西藏的潘文华，得知了武昌起义成功、南方各省纷纷独立的消息，以潘文华带队官为首的革命党人毅然率领所部官兵在地处亚东的江孜县宣布起义反正，响应武昌起义。拉萨西南各处起义军纷纷向江孜的潘文华带队官集中，形成了与拉萨互为犄角的两大起义中心，极大地声援了武昌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在西藏的统治。

1912 年，潘文华率领所部义军离开西藏取道亚东，辗转印度、缅甸，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四川，先后在川军任营长、团长和独立旅旅长。1921 年，潘文华率部投奔患难知



首任重庆市市长潘文华将军

己、同学、时任川军总司令和四川省省长的刘湘，任川军第四师师长，成为刘湘集团最核心的高级将领。在四川军阀惊心动魄的大角逐中，潘文华先后参加“一、二军之战”“讨贼之役”“统一之战”“刘、杨驱袁”“两次下川东之战”以及“二刘大战”等，多次担任独当一面的总指挥，率部转战巴山蜀水，无役不与。他九死一生，屡建奇功，喋血封疆，为刘湘最终统一四川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巴蜀战神”。

1926 年，潘文华任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督办，后改任重庆市第一任市长，在长达九年的市长任期中，他不怕困难，

艰苦奋斗，雷厉风行；他殚精竭虑，规划重庆，开拓创新；他组织拆城墙，修马路，开辟新市区；他创办重庆自来水厂，新建重庆电力厂，修建中央公园（现为人民公园）；他创办电话所，整顿消防队，兴建码头，试办轮渡和公共汽车；他协助刘湘筹办重庆大学，为川东数十县莘莘学子办起了至今闻名全国的高等学府——重庆大学。他在关系市民生计的水、电、通讯、交通等市政建设上开创了许多先河；他高瞻远瞩，规划重庆市的格局，为重庆市后来的发展和重庆市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在规划、管理、建设重庆市的许多重要建树，深受后人赞誉和敬仰。特别是1928年“五·卅”惨案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以潘文华市长为首的重庆市政府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毅然收回被日本霸占了二十多年的王家沱日租界，洗雪了国耻，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使重庆市民无不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身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三军军长的潘文华上将请缨出川。在成都少城公园誓师大会上，他慷慨陈词：

“我们一定要血战到底，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生，败则死，不成功，便成仁。”他随身携带川康父老赠送的大锦旗“为国干城”，率川军第二纵队沿长江东出夔门，雄赳赳，气昂昂，杀奔抗日前线。

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苏、皖、浙战场，潘文华将军亲自组织指挥保卫南京前哨战——广德、泗安战役，揭开了安徽抗战的序幕。他率领装备简陋的几万川军子弟兵与日本精锐牛岛师团的陆海空三军浴血奋战在太湖西岸的广德、泗安战场。川军将士不畏强敌，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打出了“草鞋兵”的军威。广德、泗安战役歼灭日军数千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从战略上有效迟滞了日军速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罪恶企图，保障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机关的安全撤离，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完成战略集结创造了有利条件，表现了川军将士精忠报国、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广德、泗安战役不愧为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日战场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正如当时随军战地记者挥泪口赞云：“广、泗军威震，义胆挫敌酋。成仁昭大节，英名自千秋！”

正当潘文华将军率部转战于苏、皖抗日前线时，噩耗传

来，川军主帅、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四川省主席刘湘猝逝于汉口。一时间，抗日大后方——四川一下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川局动荡不安。在此危难之际，深孚众望的潘文华将军从抗日前线被紧急召回成都，被川军将领拥戴为甫系集团当家人，很快出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将军继承“甫系”后，识大体，顾大局，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主动团结刘文辉、邓锡侯两将军，迅速稳定了四川的局势，巩固了抗日后方基地，从兵员、物资、后勤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

潘文华将军坚定地继承刘湘的遗志，在刘湘生前与中共建立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关系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并加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联系和亲密交往，并提出了“团结川康、支援抗战、联合中共、防蒋图存”的政治主张。在他的司令部聚集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他还先后多次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及董必武、王若飞、林伯渠、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亲切会晤，深入交换意见。他深受启发和帮助，拥护中共持久抗战的方针，反对国民党政府向日本妥协投降的政策；他赞成中共中央提出的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支持推行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



始直接同中共中央建立声气相通的统战关系。后来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潘文华将军司令部有了中共特使唐午园、甘树人以及钱松甫夫妇的红色秘密电台。

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掀起一股股反共浪潮，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潘文华将军甘愿冒着极大的风险，以自己在军政中的特殊地位，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他甚至不惜亲自给蒋介石写信担保或当面证明。诸如车耀先的秘书聂生明、高级统战工作代表张志和将军，还有汪导余、苏爱吾、田一平、明昭等。特别是当民盟中央主席张澜遭受特务殴打、受到暗杀威胁时，他挺身相救，极力保护，使特务不敢下手。

潘文华将军除与中共紧密联系外，还积极支持和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4年冬，由张澜主席监誓，他和刘文辉将军秘密加入了民盟组织，从此增强了西南的反蒋势力，也基本上解决了民盟的活动经费。在此期间，潘文华将军还利用自己兼任《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董事长的身份，大量安排进步人士主办《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唤起民众，揭露阴谋；使两报成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和“文坛中心”，潘文华也因此被美国媒体称为



1937年11月24日，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上将（左一举望远镜者）率旅长达凤冈（左二）、副官处长周瑞麟（左三）和参谋处处长陆涤生（左四）在泗安抗日前线

“民主将军”。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潘文华将军在效忠国家的同时，时刻不忘养育过他的家乡父老。1938年5月，他指挥部队，跋山涉水，翻越高耸入云的二峨山，修通了全长近百公里的成仁公路，打开了仁寿山区走向外面世界的大通道。1939年秋，他又先后出资在仁寿县文官场创办私立“文华中学”，兴办小学、开办图书馆，以教化家乡子弟。每当仁寿家乡出现灾情、疫情，军政事务繁忙的他，总是倾力相助，大力支援。几十年来，潘文华将军感恩回报家乡父老的高尚品德，一直为邑人有口皆碑、传颂不已。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举行国共和谈期间，亲切会晤潘文华将军，畅谈国内国际形势。潘文华将军

利用自己曾九年担任重庆市市长的巨大影响，联络和团结各种进步力量，维护了国共谈判的良好氛围。

国共和谈破裂后，全面内战爆发，潘文华将军先后出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他始终把握部队，避免与解放军交战，坚持与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一方面未雨绸缪，调兵遣将，收拢部队，等待时机；一方面积极联络刘文辉、邓锡侯两将军，秘密酝酿川康起义大事。

1949年11月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潘文华将军，为摆脱蒋介石的控制，悄然潜离重庆，回到了成都。在险象环生、血雨腥风的成都，他庚即与刘文辉、邓锡侯两将军秘

密成立以他们三人为核心的川康两省起义决策指挥机关，联合川康一切反蒋力量，同溃退到成都的蒋介石、张群、胡宗南、阎锡山、顾祝同等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他断然拒绝蒋介石送他去台湾的要求，与刘文辉、邓锡侯两将军商定，率先冲出成都，摆脱特务的监视和追杀。

在周恩来和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精心运筹和直接指挥下，潘文华将军终于同刘文辉、邓锡侯两将军聚首彭县龙兴寺，高举义旗，于12月9日联名通电起义。在他们的带动和巨大影响下，滞留川西的几十万国民党部队也追随起义，加快了解放

大西南的进程，使川康人民免遭生灵涂炭，蒋介石在川康的统治最终土崩瓦解。

川康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任命潘文华将军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虽身染重病，但仍然胸怀祖国、心系大西南，积极为大西南平叛剿匪、进军西藏巩固边防、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以及支援抗美援朝等献计献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务院以及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对潘文华将军的工作、生活和病情非常关心，给予了很好的安排。1950年10月，潘文华将军不幸病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人民

政府和中央政务院高度评价潘文华将军“川西起义，有功于人民”。

潘文华将军一生忠于国家、热爱人民；他饱经磨难、坚忍不拔；他百折不挠，矢志不渝；他忠厚仁义，虚怀大度；他战功卓著，却不居功自傲；他身居高位，却朴实无华；他文韬武略，却礼贤下士。他以高尚的德行情操和无穷的人格魅力为我们后人树起了丰碑，他给子孙后代留下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我们不断奋进的力量源泉，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效忠于祖国，贡献于人民。天苍苍，云茫茫，先辈之风，山高水长。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征文启事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近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

为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永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奋斗进取的价值追求，本刊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欢迎广大作者积极投稿。

征文要求：

- 1、内容围绕“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主题展开。最好是展现川军抗日的风采。
- 2、提倡短文，字数控制在5000字以内。编辑部有权对来稿进行删改；如不同意删改，请予以注明。
- 3、来稿欢迎自配图片，但应注意不要侵犯他人版权。
- 4、请勿一稿多投、重复投稿。编辑部收到征文后将在30个工作日内审稿并以电子邮件形式告知处理结果。
- 5、采用的稿件，将于本刊“抗战胜利70周年”栏目刊出。

投稿邮箱：bsszbjb@163.com

联系电话：028-86522061

《巴蜀史志》编辑部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政府法制办、省志编委组织专项调研

5月26—28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吴得民，省志编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以及省政府法制办相关人员一行，前往雅安市及石棉县、汉源县，通过实地考察和座谈交流等形式开展地方志工作专项调研。

吴得民对雅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及各级党政领导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对雅安市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一是要深入宣传条例、提高思想认识，争取得到全市各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认同，使地方志工作法规深入人心，取得成效。二是要围绕党政中心、服务工作大局，收集好、整理好、开发好、利用好地方志资源，为党政决策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三是要加强资料保护、打造方志精品，留下具有参考借鉴价值的历史资料和精神财富。四是要坚决依法行政、促进全面发展，解决好地方志工作的领导、机构、经费、队伍、场馆等问题，为地方志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王孝平希望雅安市进一步贯彻落实《条例》《意见》，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进一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行业优势，发挥地方志工作存史、资治、教化、育人作用。希望市委、市政府继续加强重视，有力有效的推动地方志工作。加快志书编纂出版，提高年鉴质量，及时跟进《“4·20”芦山强烈地震雅安抗震救灾志》编纂，积极开展旧志整理和资源开发利用，进一步加强读志用志。进一步关心重视地方志工作队伍建设，为地方志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人才保证。

4月14—15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

中科院成都分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王学定，省志编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一行，前往眉山市及仁寿县、洪雅县联合开展地方志工作专项调研。调研组听取了各地工作汇报及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困难和意见建议，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现场研讨。

王学定对眉山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及各级党政领导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对眉山市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希望眉山进一步学习、贯彻《条例》，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切实增强法治意识、规矩意识，进一步把地方志工作作为党委、政府的基础性工作，作为依法行政的法定职责、法定行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支持和保障；要把志书、年鉴作为法定出版物，督促落实县以上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基层地方志工作基础设施要根据实际，尽力优化配置、资源共享；要加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网站建设 and 人才队伍建设，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旧志等地情资源要科学开发利用，注意用典型、生动案例宣传史志，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社会易于接受。他强调，要深入宣传，提高认识，积极营造全社会依法修志的浓厚氛围；要依法行政，促进发展，以法治手段推动地方志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要科学修志，注重服务，使地方志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群众、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发展、服务于改革开放；要强化监督，推动落实。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将继续重点关注、积极支持地方志依法行政工作，不定期协调省志编委和省政府法制办开展《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检查调研，大力推进全省地方志法制化建设进程。



王孝平希望眉山市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开拓创新，打开局面。他强调，“法贵在于施行”。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理解《条例》规定，吃透“两办”文件精神，特别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逐条对照找差

距，逐项思考谋对策，逐个解决抓落实，真正做到法无许可不可为，法有规定必须为，真正使《条例》和文件成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的有力武器、强大推力；要借此锻炼和提高地方志队伍。要加强对地方志工作队伍政治意识的培养、政治方向的引领、政治素养的提升，强化地方志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和能力，省、市（州）要加强分级培训，注重实际效果；要强化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历史意识。旧志点校要慎重，地情资源开发利用要科学，可尝试用课题方式，借助“外脑”“外力”来解决技术力量等问题。

（本刊综合）

省志编委开展地方志工作调研

4月1—2日，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调研指导资阳市及安岳县地方志工作，对首轮《资阳市志》的编修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指出，在二轮县级志书已全面完成，年鉴编纂工作进入常态化、有序化轨道的背景下，地方志工作要找准新的着力点，挖掘其发展潜力，拓展其工作领域；要着眼于地情研究，抓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有目的、有规划地编纂具有地方特色的系列丛书，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要充分发掘利用方志资料，将二轮修志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产物，让普通群众更容易接受与理解，展示地方志事业的生命力与活力，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4月14日，马小彬前往农业厅，就《四川省志》相关分卷编纂工作进行调研，建议省农业厅加强领导，弥补工作上的脱节，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保持和省志编委相关部门的联系，畅通渠道，更好地沟通和

推进工作。未送终审的志稿，要按照志书要求严把政治、史实、保密、质量四关，仔细修改、打磨润色，争取早日送审；已经通过终审的志稿，要落实人员，抓紧补充修改完善后报省志编委统一安排出版；各分卷都要落实必要的编纂经费，对编纂人员的办公条件、书稿打印排版等项目做好保障。

4月29—30日，马小彬对自贡市及自流井区地方志工作进行调研，对自贡市地方志工作提出要求：一要认真落实依法修志工作，争取市委、市政府在经费、人员上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二要加大对县（区）地方志工作的指导力度，拓宽学习交流平台；三要整合地情资源资料，充分发挥地方志功能，编纂出版富有自贡特色的地情书籍，为服务自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宣传自贡做出应有的贡献。



5月5日，马小彬到攀枝花市调研。他希望市委市政府继续依法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川委办〔2015〕9号文件精神，切实落实好“一纳入、八到位”；适当增加征集购书、信息化建设等经费，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组织、工作保障，及时研究制订攀枝花市地方志“十三五”发展规划；市志办要依法加强对全市地方志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积极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争取领导及各部门的支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围绕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多做贡献。

5月12—15日，王孝平前往广元市及剑阁县、朝天区，巴中市及巴州区、平昌县开展地方志工作调研。调研组着重从“思想认识的到位情况、问题解决的实际情况、落实质量的好坏情况、具体措施的施行情况、执行政策的效果情况”等方面，通过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现场研讨等形式，对各地地方志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第二轮三级志书、年鉴、大事记



编修，加强队伍建设等情况，以及工作实践中存在的



突出困难和意见建议，进行深入的调研和探讨。调研组针对各地存在的问题，建议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担当意识要进一步提高；贯彻落实政策法规的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办法、措施要进一步细化；地方志工作的内涵要进一步丰富，外延、边界要进一步拓展；地方志工作队伍建设要进一步加强，队伍结构、人才素质要进一步优化；读志用志要进一步创新，开发、利用要进一步深化。

4月13—17日，省志编委副巡视员汪毅到德阳、绵阳、广安、达州开展地方志工作调研，结合贯彻落实《条例》及“两办”文件和相关会议精神，分别就地方志系统在机构级别、方志馆建设、班子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当地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相关领导深入交换了意见，对抗震救灾志编纂进度、《条例》贯彻落实、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和加快市县两级志书编纂进度、打造精品良志等提出要求和建设性意见。



5月4日，汪毅前往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调研《四川省志·乐山大佛志》编纂工作情况。他指

出，乐山大佛具有千年历史，《乐山大佛志》首次编修且被纳入《四川省志》序列，这对全省和乐山文化传承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定要按照志书质量要求，把《乐山大佛志》作为精品志书来打造，力争树立特色志的标杆。

5月4—8日，汪毅到乐山、宜宾、泸州开展地方志工作调研，希望各地继续贯彻落实《条例》、“两会”和川委办〔2015〕9号文件精神，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实施办法或意见；坚持依法修志，提高依法履职水平，充分发挥好地方志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职能，深入推进“依法治志”。要积极谋划地方志工作“十三五”规划，推动未来五年地方志工作持续、健康、有序发展；要进一步理顺县级地方志系统体制机制，确保地方志工作真正实现“一纳入、八到位”；要加强志书年鉴督导检查力度，按时保质完成第二轮志书编修任务；要做好信息化建设，积极探索方志数字化，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方志馆；要加强队伍建设，健全地方志机构，充实业务人员；要加强地情成果整理，加大地情资料开发力度，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服务。

（本刊综合）

《四川省志》第二十三次终审会召开

4月23日，《四川省志》第二十三次终审会召开。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四川省志》总编马小彬主持会议。省民宗委、省保密局、省统计局、省志编委、省社科院、四川大学等单位的《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成员及特邀委员参会。



本次会议审查了《四川省志·川剧志》《四川省志·教育志（1986—2005）》两个分卷。省文化厅原副厅长王志平、省教育厅原巡视员李卓明分别汇报了

两个分卷的编纂情况。审核委员会各成员对两个分卷的政治、保密、体例、史实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审查。终审委员会认为：《四川省志·川剧志》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了川剧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采用章节体与条目体结合的方式记述川剧剧目、声腔音乐、表演与导演、舞台美术、演出与流变、教育与传承等内容。专设艺文篇，突出川剧特有的人文性，具有比较鲜明的区域特色。《四川省志·教育志（1986—2005）》根据20年四川教育发展实际，专篇记述高校党建、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大学中专招生考试、民办教育、对外交流等内容，既保持了前后两轮志书的连续性，又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具有较高存史资治价值。两个分卷志稿符合中指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和《四川省志》质量要求的有关规定。同意通过终审。会议要求两个分卷的牵头承编单位要严格按照本次终审会议提出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志稿，确保省政府组织实施的志书编修实现精品工程的目标。至此，《四川省志（1986—2005）》93个分卷中已经有47个分卷通过终审验收。

（李海毅）

《四川省志·九寨沟志》编纂工作积极推进

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后，九寨沟管理局认真贯彻此次会议精神，按照川委办〔2015〕9号文件要求，加快推进本局地方志工作。4月1日，九寨沟管理局正式启动《四川省志·九寨沟志》编纂工作，成立了编纂工作领导小组，按照“一纳入、八到位”工作原则，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了编纂该志的三年规划，列出了各阶段工作重点任务，并对具体工作进行细化，明确工作责任。日前，已收集到照片25000余张、相关书籍115本、重要光盘66张；经过认真梳理和筛选，对上述资料进行文字录入达117万余字；同时，收集整理九寨沟大事记、历年年鉴、科研保护等文字材料达64万余字。

（冯国梅）

成都传达贯彻第八次全省会议精神

3月23日，成都市志办组织干部职工传达学习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党组书记、主任高志刚对深入贯彻会议精神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认真学习，全面领会。责成秘书处将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

会议材料整理成册，印发干部职工人手一册学习，同时建立学习督查机制。二是深入解读，找准基点。责成各处、年鉴社结合自身职责，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座谈讨论，真正学深悟透会议精神，找准贯彻落实的结合点、落脚点，处室及个人写出贯彻落实意见，进一步牢固树立依法行政、依法修志的法治意识，强化责任意识、执行意识。三是精心筹划，周密准备。由秘书处牵头、各处配合，精心准备即将召开的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材料，切实把全国、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贯彻体现在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报告中，科学、合理确定今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地方志工作规划，为全市地方志工作持续稳步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

德阳市方志文化进学校在中江启动

3月25日，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中江县地方志办公室在中江县实验小学举行向中江学校的方志图书赠送仪式，标志着全市“方志文化进学校”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市志办主任李思源在讲话中希望通过学校这个平台，让广大师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地方志，通过对地方志的学习，传承中华文明，了解当代中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本土文化的凝聚力，坚定投身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为实现“中国梦”努力的信念。中江县副县长何革要求各校充分引导学生使用学习好地方志书籍，真正实现地方志育人的功能。各校与会代表表示，这批地方志书籍十分珍贵，对教师和学生今后的工作学习均有积极意义，会充分利用好这批资料。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内江“四大契机”促推史志工作

内江市地方志办公室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创新思路，主动介入，做到有为有位，使地方志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一是结合地方志的资源优势，主动介入市委市政府重大项目“内江中国长江记者家园、范长江纪念馆新馆”的软件资料打造工作，参与核心软件的提档升级工作，负责馆中所有展出资料的规划、搜集、分类、整理，为纪念馆提供了500余分钟的录音资料、光碟5张、文字资料200余万字、图片资料200余幅，



倾力打造内江红色文化名片，极大地充实了新馆的史料，深得游人及社会各界的好评。

二是以内江修建融历史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于一体的文化旅游景观十贤坊为契机，主动作为，将内江古往今来最能代表内江文化魅力的十位贤者的故事编辑成6万字的资政育人丛书《内江十贤》，追溯他们的文化遗迹，传颂他们的动人故事，承继他们的崇高精神，丰富十贤坊的文化底蕴，彰显内江的人文风貌和城市文化底蕴。

三是主动介入新兴优秀旅游目的地的打造，扩大内江对外影响力，编辑《内江胜览》，准确、生动、形象地记述全市三县两区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41处名山、秀水、古迹、寺庙、纪念馆，并且每处景点配以3至4幅精美图片，着重展示内江的特色风貌。

四是组织编辑40万字《内江城市发展》，着重反映1998年至今内江城市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规律，展望未来城市发展动向，为市委市政府的新城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内江市地方志办公室）

乐山创新修志举措

为深入贯彻落实川委办〔2015〕9号文件和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乐山市地方志工作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新工作机制，以目标考核为引领，进一步推进依法修志工作格局。一是积极争取领导支持。年初，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重新将地方志工作纳入了全市目标考核体系，地方志既作为“党的建设”保证内容对区县党委政府进行考核，又作为“重点工作”保证目标对市级部门进行考核。对县（市、区）政府贯彻落实《条例》情况列入了市人大教科文卫工委今年工作调研内容。二是扎实抓好“十二五”规划收官。在市、县两级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基础上，重点加强对已规划市级部门（行业）志书的督促指导，继续落实责任编辑联系17个市级部门业务指导制度。三是坚持“一年一鉴”不断推陈出新。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作为当前地方志编修的拳头产品，认真吸收借鉴先进经验做法，创新编纂内容体例，不断推出精品良鉴。确保市、县地方综合年鉴在11月底前全面完成公开出版工作。四是创新地情资源整理开发。通过项目课题制等方式向社科组织、专家

购买社会服务，推进地情资源开发利用，为新常态下乐山“转型升级、美丽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乐山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

4月2日，乐山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全市11个县（市、区）志办主任及市志办全体人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全市2014年地方志工作，安排部署了2015年工作，交流学习了贯彻川委办〔2015〕9号文件精神情况，通报了2014年全市地方志系统综合先进、单项先进单位名单，代颁发了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编纂工作先进集体奖牌和证书，并听取了区县对拟订《乐山市〈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的意见建议。

会议强调，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好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市地方志系统的首要任务；全市地方志系统广大修志工作者要牢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以“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政治态度，牢固树立创新意识、精品意识、服务意识，大力整治“为官不为”现象，激励奋发有为的用人导向，提高做好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能力，努力创建“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服务型”地方志部门。

（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安召开区市县志办主任会议

4月22日，广安市区市县志办主任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讨论研究了《中共广安市委办公室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讨论稿）。

市志办副主任谯小松对全市地方志系统领导干部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建设好一支守纪律的地方志领导干部队伍，做到守政治纪律、不乱说话，守财经纪律、不乱花钱，守工作纪律、不乱作为，守生活纪律、保持作风正派。二要建设好一支讲规矩的地方志领导干部队伍，做到遵纪守法，严格执行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认真遵守本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三要建设好一支清廉务实的地方志领导干部队伍，做

到业务精湛、勤政廉洁，增强服务大局意识，提升修志工作能力和水平。会议还对近期全市地方志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雅安市召开《汶川特大地震雅安抗震救灾志》终审会议

近日，雅安市召开《汶川特大地震雅安抗震救灾志》终审会议。市政府副秘书长李阳军受黄剑东常务副市长委托，代表市政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市志办和编辑室的工作，并对志书的即将出版表示祝贺。他指出，《汶川特大地震雅安抗震救灾志》编修之所以能取得阶段性成果，是省志编委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结果，是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众手成志”的结果，是地方志系统所有工作者甘于清苦、勤奋工作的结果。他要求，市志办要根据终审会提出的修改建议和意见，把工作做实做细，力争将所有错误和问题消灭在出书之前，争取给全市人民一部内容全面、体例规范、装帧精美的志书。市志办主任师伟对书稿的后期修改定稿和出版发行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进一步明确责任、细化措施，组织人员对全志的文字和图片进行再修改、再斟酌、再核实、再完善，力争在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两周年（即7月20日）之际正式出版；二是要认真做好志书的发行宣传和读志用志工作，积极开展向援建雅安的湖北省、海南省和广安市以及援助雅安、关心关注雅安的各级各界的赠书活动，充分发挥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感恩奋进、聚力重建的作用。

（雅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眉山市人大常委会向市政府送交《条例》实施情况审议意见

近日，眉山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组关于检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贯彻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增强修志意识、推进基础工作、开发利用地情资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贯彻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过程中，还存在思想认识不高、工作保

障不足、修志为用不够等问题，就眉山市进一步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提出了依法履职、强化保障、突出开发的审议意见。5月4日，眉山市人大常委会以眉



人发〔2015〕7号向市人民政府送交此审议意见和执法检查报告，请市人民政府“研究办理，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将在2015年8月召开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进行满意度测评”。

（刘艳平）

眉山市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4月8日，眉山市政府召开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眉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吴小可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了川委办〔2015〕9号文件要求，总结回顾了首轮市志编修工作以来全市地方志工作，安排部署了2015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

吴小可针对当前眉山工作实际，重点强调了首轮市志编修工作情况，对未按时报送合格入编资料的14个市级部门、单位进行点名，一一明确最后完成时限。要求各区县、市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狠抓工作落实；要确保时效，各部门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入编资料报送，市志办要确保今年底完成《眉山市志》初稿；要强化督查，对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单位，将由两办督查室进行督查，工作情况年终与目标考核挂钩。

马小彬高度肯定眉山地方志工作，对今后眉山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提出要求。一是继续加大领导力度，市人大、市政协继续加强督查调研，进一步稳定体制、稳定修志格局；二是各参编单位要注重日常资料收集整理，做好文件、大事记、资料长编，积极向市



志办提供高质量入志、鉴资料；三是市县两级地方志机构要加强业务指导、强化依法修志意识，抓好部门志、乡镇志等指导培训，注重办公信息化、自动化建设，制订旧志整理中长期规划，有序推进旧志整理等工作。建议眉山市委、市政府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政府“十三五规划”；整合地方资源，力争将方志馆建设纳入整体规划。

（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探究历史规律 镜鉴资治育人

为深入探究两宋时期眉山进士群体现象及进士文化，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动作为，将《两宋时期眉山进士文化研究》课题作为挖掘地情文化的重要工作之一，2014年组织专家课题研究组，通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形成8000余字的专题研究报告。《巴蜀史志》《四川经济日报》等媒体刊发了报告主要内容，《天府智库》以《优秀高端人才群体涌现需要什么条件？——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现象及当前发展文化教育的重要启示》为题出了专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范锐平作了重要批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吴靖平批示将其作为省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资料。

眉山志办以深具代表性的“眉山进士群体”历史文化为着眼点，通过系统分析、科学论证，深刻阐释了文化发展的力量，从而揭示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层面的鱼水关系。

研究报告认为，两宋眉山进士群体具有重要的符号与现实意义。眉山的科举文化是科举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巅峰，与“三苏”一起成为眉山文化鼎盛的符号。眉山虽地处西南一隅，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以“三苏”为代表的进士群体，却形成了科举史上的巅峰。由此可见，文化教育作为上层建筑，既受经济基础的影响制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以进士群体文化现象为象征的眉山文化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昭示后人必须充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而其培养进士的成功经验亦值得后世学习借鉴。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全省地方志工作机构在认真贯彻落实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和川委办〔2015〕9号文件精神工作中，不妨

学习、借鉴眉山等地的做法和经验，立足本地实际，主动积极作为，深度挖掘历史资源，扎实加强地情研究，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育人”的历史和现实功用，提高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能力，为本地及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黄绚）

甘孜贯彻落实第八次全省工作会议精神

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后，甘孜州十举措狠抓会议精神落实。

一是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执行意识，切实实现地方志服务社会、服务现实、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开展依法修志宣传活动，促进依法修志工作格局进一步落实，督促各级各部门依法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严格做到“八到位”；三是继续推进年鉴编纂常态化，坚持志书质量第一标准，精心编纂出版高质量的州、县、部门综合年鉴；四是加大修志业务技能规范的学习培训，开展“评鉴”研讨活动，加强对各县和州级部门志书年鉴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推动全州地方志编纂工作水平的提高；五是加大地方志宣传力度，深入推进“志书七进”和读志传志用志活动，不断提高志书的社会影响力；六是积极做好地方志文献资源收集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七是切实抓好地方志书信息化建设工作，推进全州地方志成果电子化进程；八是完成《甘孜州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制定发布工作，指导各县志办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地方志事业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九是积极推进全州藏文版志书编纂出版工作；十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加强地方志工作队伍建设。

近日，甘孜州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决定启动新一轮地情书籍开发工作，安排由资料宣传科和综合科牵头，其他科室配合，采取本土与外聘相结合的方式，着手开始《康巴旧志》《尹昌衡西征》《刘文辉经略西康》等三部书籍的编撰工作，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编写、审查、出版任务。

（甘孜州地方志办公室）

金牛区数字方志馆正式上线并向公众开放

经过精心设计与制作，成都市金牛区数字方志馆

网站（<http://www.cdjndfz.com>）于3月4日正式上线并向公众开放。该网站是全市较早利用数字化平台建成的数字方志馆之一，全方位动态展示金牛区基本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内容丰富，结构清晰，用户只需轻轻一点，便可快速获得想要查询的图文资料。数字方志馆包含金牛百科、地方写真、方志动态、图照金牛、区情文献、馆藏书目等六个栏目，具有开放性、实用性、互动性等特点，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以地情资料信息为主的服务平台，为促进地方志工作常态化开展提供了保障，以期更加快捷地为金牛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成都市金牛区地方志办公室）

叙永县贯彻两办《意见》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印发后，叙永县委副书记唐杰批示：“档案史志局：川委办〔2015〕9号文件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史志工作纲领性文件，务必认真贯彻落实。史志工作关键在领导，基础在一线，要认真做好到2020年前的规划，按照规划扎实推进。越是落后，越要重视修志。只有从历史的视野去审视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才能避免再次犯同样的错误；也只有将多年来叙永干部职工不畏艰难、创业苦干的精神总结提炼出来，才能激发大家的热情，专注叙永科学发展、加快发展，尽早摆脱落后的局面。”3月26日，叙永县档案史志局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进行学习，要求切实贯彻好、落实好、实施好文件精神和县委副书记唐杰的重要批示，全面推进该县地方志工作，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

（叙永县档案史志局）

中江开展方志文化进村社活动

3月24日，中江县召开2015年第一次县级部门工作汇报会。县委书记刘应刚对地方志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抗震救灾志要能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中江的抗震救灾工作，要能生动、活泼、具体地反应中江的干部群众在抗震救灾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二是全县的方志工作要作好规划，从历史角度思考，结合中心工作，为中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好服务。三是配合相关部门，作好历史文化古籍的抢救整理，弘扬

中江传统文化。四是整合社会文化资源，加强方志馆建设。

3月25日，刘应刚带领县委副书记冯军，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严键，县文广局、县志办到县图书馆捐赠图书、现场办公，调研方志馆建设工作。同时，对整合图书管理资源、配套方志馆建设、宏扬地方文化、保护古籍、加强精神文化阵地建设等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和意见。

4月14日，中江县志办到所联系的继光镇开展方志文化进村社赠送图书活动，为继光故居和继光镇白寨村赠送了《中江县志》《中江年鉴》《中江文化遗产志》等介绍中江、宣传中江的书籍，并在送书活动中与新联系的白寨村村委进行工作沟通和衔接，对白寨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将给予帮助。

（中江县地方志办公室）

嘉陵区全面启动乡镇（街道）志、部门志编纂工作

南充市嘉陵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印发了《关于启动嘉陵区第一轮乡镇（街道）志、部门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全面启动了全区45个乡镇（街道）、74个部门志书编纂工作。通知要求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加强志书编纂工作的领导，落实志书编纂工作的责任，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要求成立志书编纂委员会和编纂工作机构，配备专职编纂人员，落实专项工作经费，创造良好工作环境；要求区志办加强志书编纂业务指导，强化志书编纂人员业务培训，把好志书质量指导关、审查验收关，确保志书编纂质量。

嘉陵区乡镇（街道）、部门志书编纂工作采取由嘉陵区财政局等6个单位、世阳镇等6个乡镇试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计划用2年时间完成。嘉陵区委目标督查办将志书编纂工作纳入各级各部门年度目标考核，并采取不定期督查通报，严格考评，确保志书编纂按计划圆满完成。

（南充市嘉陵区地方志办公室）

江安、筠连开展史志资料征集工作

3月12日，江安县地方志办公室到仁和乡调研红军游击队在仁和钟顶山的活动情况。通过走访老同



志、实地到红军洞开展照片拍摄等方式采集资料，并收集到当年红军捣药的碓窝等珍贵物品。

近日，筠连县委组织部、县老干部局和县地方办公室组织启动了离休干部人物资料集——《光辉的足迹》编写工作。这是全县首次大规模对离休干部生平和事迹的抢救、挖掘、收集和整理，既是对筠连发展历史的保存和记录，又是对老一辈建设者优秀传统的致敬和弘扬。

(江安县、筠连县地方志办公室)

高县开展史志宣教工作

3月，高县地方志办公室印发《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宣传册1000册，开展《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宜宾市〈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的宣传贯彻活动。

(高县地方志办公室)

兴文“四个确保”安排业务工作

兴文县地方志办公室提出四个确保，整合安排部署全年工作。一是要确保起好上传下达的纽带作用，继续将“大管家”服务发挥实效；二是要确保载史严谨、统筹兼顾、纵横拓展的工作态度，肩负好“以史立业”的大任；三是要确保牢固树立依法修志意识，保证以质量与创新作为立志之本，发挥地方志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四是要确保各司其职、分工协作、高效办公。

(兴文县地方志办公室)

色达县“五举措”加强年鉴编纂工作

一是调整充实《色达年鉴》编纂委员会成员，由州委常委、秘书长、县委书记张平森担任编委会总顾问，并明确主编、副主编。

二是县委、县政府及时研究下发《关于做好〈色达年鉴（2015卷）〉编纂工作的通知》，对年鉴编纂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三是在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期间，召开《色达年鉴（2015卷）》编纂工作会，张平森以及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对编纂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提出

要求。

四是将《色达年鉴（2015卷）》编纂工作纳入全县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强化督导、检查、考核，对领导不重视、资料报送不及时、相互抄袭的，县督办将通报全县，并在年度考核中扣减相应分值。

五是在《色达年鉴（2015卷）》编纂工作中严把政治关、编写关、审稿关、保密关，努力做到语体规范、文字规范、语言规范、条目规范、内容规范、格式规范，不断提高地方综合年鉴的编写水平。

(色达县地方志办公室)

西昌市出台乡镇志部门志审查验收意见

西昌市于2012年全面启动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为加强对乡镇志、部门志的审查，近日，西昌市制定出台乡镇志、部门志审查验收意见。明确：在市地方志办公室成立“西昌市乡镇志部门志审查验收办公室”，由市政府副市长代义担任审查验收顾问；乡镇志、部门志上报终审验收时，送审单位需填报《审查验收意见表》，市审查验收办公室收到送审稿后，需在2个月内提出审查验收意见；各送审单位根据《审查验收意见书》提出的修改意见再作修改，修改完成后再次送审；经审查合格并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批准出版的志书要按照全市统一的志书封面、封底规格、编号等要求和标准于2015年底前自行出版发行。未经审查和批准，一律不准出版发行。

(西昌市地方志办公室)

美姑县认真贯彻落实两办《意见》

一是县委办通过党政网，及时向各乡镇、各部门转发《意见》，要求各级各部门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二是分管史志工作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沙德康组织《美姑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单位，集体学习《意见》，并结合实际开展讨论，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三是县委办、县政府办联合印发2015年美姑年鉴编纂方案，安排部署2015年年鉴编纂工作。四是启动《中共美姑县党代会文献选编》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美姑县史志办公室)